



> 系列报告

强制隔绝

(三)

法律途径剥夺



safeguard
DEFENDERS



强制隔绝

强制隔绝是由三个主题组成的系列报告，探讨中国程序正义严重恶化的问题。《强制隔绝：法律途径剥夺》是该系列的第三册。检视了中共当局日益泛滥剥夺嫌犯会见辩护人的各种手段。这些措施包括强迫被拘留者解雇自己的律师、接受国家指定的官派律师；威胁律师倘若承接敏感案件就会被吊销或撤销执照；透过不正当的借口阻止律师与委托人在看守所门口会面。第一册《强制隔绝：嫌疑人的消失》，揭示了警方在审前拘留中心用假名登记嫌疑人的作法，使得律师难以会见委托人，并使其家属无法得知亲人的关押处所。第二册《强制隔绝：中国的伪释放》，研究了美国法学教授孔杰荣首先提出的“伪释放”一说，即犯人自监狱或看守所获释后，仍遭警方任意拘押或软禁在自家住宅、酒店，或某个秘密地点数周、数月甚至长达数年。

关于保护卫士

保护卫士是一家成立于2016年的人权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在亚洲一些最恶劣的人权环境国家开展并支持当地的实地活动，以促进保障基本人权和法治，并提高当地公民社会和人权捍卫者的能力。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 | [@safeguarddefend](https://twitter.com/safeguarddefend)



强制隔绝：法律途径剥夺

© 2021 保护卫士 | 封面插图：Antlem 绘图设计：Sandra Soler Peyton

研究与撰写：Dinah Gardner 协助研究：张志明

保护卫士出版，

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出版人和作者的书面同意，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整体或部分的转载、复制、翻印，但内文和评论中的简短引用除外。

关键词：中国，人权，刑事司法，法治，人权律师。



目录

简介	4
方法一：针对被拘留者	9
1: 安上国家安全罪名	9
2: 强迫被拘留者接受官派律师	14
程渊: 长沙富能案	21
3: 藏匿被拘留者	24
方法二：针对家属	25
1: 将家属和被拘留者分开	25
2: 威胁或恐吓家人	27
常玮平: 消失的律师	28
3: 拘禁或使家属失踪	30
方法三：针对律师	31
1: 律师证武器化	34
王宇: 有些办案警察非常蛮横	38
2: 官僚障碍	42
3: 干扰会见	44
4: 新冠肺炎期间的限制	44
任全牛: 想从事诉讼业务, 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46
5: 会见条件	49
法律分析	50
国内法	50
律师的独立性	50
国际法	51
王全璋: 拒不认罪的律师	52
结论	55
附录: 失去律师证的律师 (2016–2021)	56

简介

2020年8月某天的黎明破晓后几个小时，来自香港的12位年轻民主活动人士挤进一艘前往台湾的快艇内。在这座城市实施了严酷的《国家安全法》一个多月之后，他们尝试着逃离。那是一部将所有反政府抗议都判定为犯罪行为法律。在秘密启程仅两个小时后，中国海警就抓获了他们的船只。这12人后来被称为“12港人”，被关押在深圳的一间看守所内。后来，其中两名未成年人被送回香港，但被留在中国大陆的另外10人，在12月的秘密审判中被判处有期徒刑。他们当中无人获准会见自己选择的律师。相反，他们被迫接受国家指定的官派律师，以满足这种秘密摆样子审判符合法律正当性的错觉。

2021年1月4日，案件了结不过几周，受到家属委托代理12港人的两位中国人权律师收到通知，他们的执业律师证将被吊销。任全牛和卢思位都是在其领域获得高度尊敬、并且多年来受理敏感案件的律师。二位均无法会见他们的香港委托人，也都公开表示警察非法且持续地拒绝他们会见、并且警告他们不要参与这些案件。名义上，吊销他们律师证的理由并未提及12港人案。任全牛被告知，他是基于2018年一次为法轮功（遭禁的宗教团体）的一位信徒辩护时的“不当言论”而遭受处罚。卢思位则被告知，他因为在网上发表“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评论而受到惩罚。两位律师都驳斥这些理由为虚假托词，并称12港人案才是可能的原因，尤其在考虑到先前遭受的威胁和事发时机的情况下。在该报告即将发布之时，又一位曾试图代理12港人案的大陆律师执照遭到注销（蔺其磊）。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39条保障被拘留者在提出请求后的**48小时内**基于其选择（或通过家庭成员的委托书）获得会见辩护人的权利。任全牛和卢思位先是被禁止为委托人辩护，接着再因为他们坚持辩护而失去职业，这种经历在中国律师当中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故事。虽然这种对维权行动的攻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类似案例早在2000年代初期的人权律师运动之初就已经发生¹，但在2012年底上台的习近平的统治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决心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将律师完全掌控在其手中，而律师对当局究责的空间原本已不大，如今仍在迅速萎缩。这些策略不仅旨在削弱现有人权律师的力量，还着眼于威吓、吓退未来可能成为人权律师的人。

习近平时代对律师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联合打击是2015年夏天的“709大抓捕”，当时有数百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因国家安全罪被失踪、拘留，并被判入狱。在随后的几年之内，个别律师成为攻击目标——他们失去执照、被失踪，有些甚至被拘留并被判入狱。第二个分水岭发生在2019年12月，十多名律师和维权人士在中国东南沿海厦门市的一栋私人住宅参加了一场集会（厦门集会）探讨民主理念后，遭到“1213专案组”围捕。

这类镇压抢占了世界各地头条新闻，让中共在国际声望方面付出高昂代价。虽然中国变得更富裕、更强大是显而易见的，它却不太在意自己的国际声誉。这可以从它在国内明确的排外政策以及对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中看出（战狼外交、对批评或激怒中国的国家征收恶性的



贸易关税，以及以逮捕外国人为基础的人质外交...等，在此仅举数例）。北京似乎开始认为大规模镇压是不必要的（且并非完全有效），转而集中精力通过比较不戏剧化的方式来压制维权律师。借由使用不太起眼的手段来阻挠律师为委托人辩护的努力——经常性地在看守所阻止会见，为嫌疑人强制安排顺从政府的官派律师，并采用诸如注销或吊销律师证等行政处罚迫使独立律师无法再从事维权活动。

阻止律师与委托人会面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相关社群创造了「会见难」这个术语来描绘它。

为此，在过去几年中，关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法规被悄悄修改，以便使当局更容易直接通过司法局或间接通过向律师事务所施压来控制律师。任何敢言或有抱负的人权律师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失去工作。虽然这些手段实际上是非法的、打压性质的，却被伪装成是合法的，为中共提供了掩护。即使遭打压的律师对外发声，他们的故事在国内外引发的关注远不及大规模逮捕或一位拒绝承认捏造的国安罪名的律师在拘留期间遭受酷刑的经历。

中共如今似乎更倾向于“无声镇压”，以彻底根除人权律师。一直以来，他们企图维持“法治”的虚假表象，培养一种法律职业，即法律从业者屏弃独立性、服从警察和法院、不挑战权威与既有规则或政策，他们仅仅通过法律系统来协助引导案件，并指引它朝着当局期望的方向发展²。

这份研究报告揭露，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共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方式来打击维权行动。首先，针对被告人，第二，针对被告人家属，第三，针对律师。被告人被迫解除委任他们的律师，转而接受官派律师；警方通过为他们登记假名或不通知其家人他们关押地点等方式来隐匿他们行踪，这样他们的律师也无从知道他们的下落；或者他们被迫安上国家安全罪名，如此就成为一种例外情况，允许警察绕过被告人自动享有的法律辩护权利，该权利在此情况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又或者，警方可能强迫、威胁家人不得聘请律师或解雇他们指定的律师。最后，警方可能会通过威胁、恐惧和官僚作风的结合，将矛头对准律师。这些策略包括以吊销律师证、暴力威胁，以及无止尽的官僚障碍来阻止所有寻求会见客户的努力，包括要求提供额外文书的虚假规定，或声称没有会见室可用或值班人员不足等。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爆发，疫情也成为阻止律师与委托人会面的一个好用藉口，无论是否存在本地传播。在许多情况下，诸如视频通话等疫情下的安全替代措施并未得到良好实施。

作为该侵犯人权行为极其恶劣的一个例子：在 2013 年至 2018 年间，至少有数十名被拘留者遭到禁止会见律师，但被迫会见官方媒体人员并在镜头前认罪，且这些认罪画面在全国播出，甚至某些案例在全球播出。在许多情况下，此类供词由警方编写并通过酷刑和威胁等方式强迫提取³。

在保护卫士利用采访和网络搜索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 82 起案件的被告人在 2015 年至 2021 年 8 月期间被迫（通常通过使用酷刑和/或威胁）解雇他们的律师。由于这是通过有经报道或传闻得来的数据，真实数字可能高出好几个数量级。通过使用其他数据，包括来自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CHRLCG) 的数据，至少有 35 名律师在 2016 年到 2021 年 11 月之间因为处理敏感案件而被注销或吊销律师证。

当然，两种本质上都属在秘密地点单独监禁的羁押制度——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RSDL) 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留置——也允许警方拒绝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所有联系。在保护卫士正在进行的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受害者的长期研究中，截至 2021 年 6 月，在 173 个记录在案的案例中，警方允许律师会见的情况几乎闻所未闻（仅有一个案例）。

即使中国的定罪率约达 99.9%⁴，一名好的辩护律师可能有助于减轻刑罚，借由将滥权行为公之于众来促成一定程度的问责，并撰写报告提交给国际机制，而最重要的是，还能提供一条连接被拘留者和他们所爱之人的生

命线。尤其，由于在拘留（包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留置）的最初几周遭受酷刑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在此阶段警方会试图逼供，因此这是会见辩护人的最有利关键时期。当然，这也是律师被拒绝会见其委托人的最普遍时期。

国际人权法和中国本身的国内法均规定允许被拘留者及时会见自己选择的律师。虽然这份报告侧重于人权案件，但在线研究也显示了中国对被拘留者的类似侵权行为全面性涵盖各领域。通过破坏这种基本的保障——向自己指定律师咨询的权利——中共剥夺了其公民获得公平审判的任何一线希望，使中国所谓的司法体系显得荒谬滑稽。

**

《强制隔绝（三）：法律途径剥夺》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一系列针对律师、被告人，和被告人家属的措施来阻止律师会见委托人，借此来强化它对维权行动的镇压力度。这是保护卫士描绘 2012 年底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法治严重恶化的《强制隔绝》系列报告的第三册，也是最后一册。



中国法律下的会见辩护人权利

什么法律涵盖了法律辩护权利的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 33 条至第 40 条规定了在中国境内的被拘留人员会见辩护人的权利，和辩护人会见其委托人的权利。⁵⁶

谁能担任辩护人？

被拘留者从警方第一次讯问之日起或被拘留之日起，最多可以委托**两人**为他们辩护（第 33 条）。

在调查阶段，这些人只能是有执业律师证的律师（第34条）。

在调查阶段之后，这些人可以是有律师资格证的律师，或朋友、家人或工作单位推荐的人等。被拘留者也可以选择为自己辩护。

侦查阶段是何时以及为期多久？

侦查阶段从嫌疑人被拘留的那一刻开始，持续到正式逮捕之后，直到案件提交检察院审查起诉。

在正式逮捕前最多可以拘留37天，加上最长7个月的审前调查，这使得侦查阶段可以长达**超过8个月**。如果再处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总共时期最多可以延长到**13个月**。

谁不能担任辩护人？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但属亲近家庭成员的情况除外（第33条）。

如何聘请辩护人？

犯罪嫌疑人有权自行安排辩护人，也可以委托授权近亲属或监护人代为聘请辩护人（第34条）。



若他们无法聘请律师怎么办？

若因经济困难或残疾等原因，被拘留者及其家属均无法聘请辩护人，法院、检察官或警方必须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定一位法律援助律师为其辩护（第 35 条）。

此外，值班律师常驻法院和看守所，为没有法律辩护人的在押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第36条）。

他们何时可以会见律师？

警方应告知被拘留者，自第一次审讯或拘留之日起他们有权聘请法律代理人（第 34 条）。

看守所必须在合格律师提出请求后的 48 小时内允许会面（第 39 条）。

然而，如果案件涉及国家安全犯罪或恐怖活动，在侦查阶段（见上文），必须先向侦查机关（通常是警方）取得许可（第39条）。侦查阶段之后，无论犯罪是否涉及国家安全，警方都无权拒绝会见律师。

辩护人如何与委托人会面？

合格律师必须出示“三证”，即有效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委托书，以及委托人、家属（或法律援助机构）的委托书。

非执业律师辩护人，只需要委托书，但必须事先获得司法部门的许可才能会见委托人以及查阅案卷（第39、40条）。

方法一：针对被拘留者

有一天，专案组的人突然又来找我，让我写一份拒绝家人给我找律师的拒绝书。因为已经比较熟了，他告诉我：“如果你坚持见这位律师，我们就把他带走”。我知道他们做得出来，所以我说，我可以写这样一封拒绝书……几天后，专案组又来了，让我签署一份律师聘请协议，让我接受一个国家指定的律师，一个叫董阳的人。我照他们的要求签字了。直到我被送到看守所，才在几个审讯人员的陪同下见到了这个他们指派给我的律师。我之后再没听说过他。⁷

人权活动人士 唐志顺

针对被拘留者时，当局通过法律和法律外的手段来阻止其与律师会面。例如，在侦查阶段，警方可以将案件归类为国家安全案件，这赋予他们权力，要求所有律师的会见都必须先获得警方的许可，然而照惯例大多会被拒绝。或者，如同本章开头引用的唐志顺案一样，通过酷刑或威胁手段迫使嫌疑人解雇自己的律师并接受官派律师。唐志顺被秘密关押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并遭受了大量的折磨，从威胁要伤害他的妻子与孩子，到逼迫他坐上悬空的圆凳，并在此度过漫长而痛苦的时光。该圆凳高于一般的凳子，防止受害者脚触地以支撑自己身体的体重，从而使背部和臀部承受着身体的巨大压力。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直接让嫌疑人消失：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断绝人与外界的所有接触，在看守所以假名登记，并拒绝将关押地点通知亲友。

在人权相关案件的侦查期间，一种常见的阻止律师会见的方式就是指控被关押者涉嫌国

1: 安上国家安全罪名

家安全罪名。这些罪名罗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修正)⁸ 第101到113条当中。它们包括：

- 颠覆国家政权（第105条）— 最常适用于人权捍卫者；
-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第105条）— 最常适用于人权捍卫者；
- 分裂主义（第103条）— 最常适用于少数民族；以及，
- 窃取国家机密（第 111 条）— 最常适用于外国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⁹，律师必须先取得侦查机关（通常是公安机关，在某些情况下是国安部门）的允许才能会见委托人。然而警方往往忽略或拒绝这些请求，这样的作法被人权律师认为是破坏了该法规作为例外而非常规的本质。



由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定上限为 6 个月，或者如果嫌疑人被关押在看守所，则有 37 天的法定上限，此外审前侦查阶段最长可达 7 个月，这是相当漫长（分别为 13 个月或 8 个月以上）且无法获得任何法律辩护的一段时间。一旦侦查阶段结束¹⁰，案件被移交检察院手中，警方就不再有权拒绝律师会见。国家安全罪例外条款同样限制律师获取有关委托人案件证据，例如以国家机密为由¹⁰，不允许律师复印某些案卷。

警方的《不准予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清楚地表明这样的文件是多么地例行公事，以至于使用一个留有空白栏位的范本来填写律

师的姓名、律师事务所、执业证号码和拒绝会见原因。此处的案例是珠海市公安局发给任全牛律师的通知，以国家安全罪为由拒绝了他会见委托人甄江华的申请。

值得注意的是，在核发通知当时——2018 年 1 月——修订版的刑事诉讼法尚未通过。此处提到的旧法第 37 条，是现行法的第 39 条（2018 年 10 月修订）。

在谷歌或百度图片快速搜索“不准予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会出现好几十个例子，包括空白范本。



系列报告
强制隔绝

珠海市公安局 不准予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

珠公不准见字〔2018〕0001号

申请人任全牛，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执业证编号14101201010185525。

因甄江华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案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会见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
秘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
之规定，决定不准予申请人会见犯罪嫌疑人甄江华。



此联交申请人

任全牛律师于2018年1月收到来自珠海公安局的决定书，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名义拒绝他与其委托人甄江华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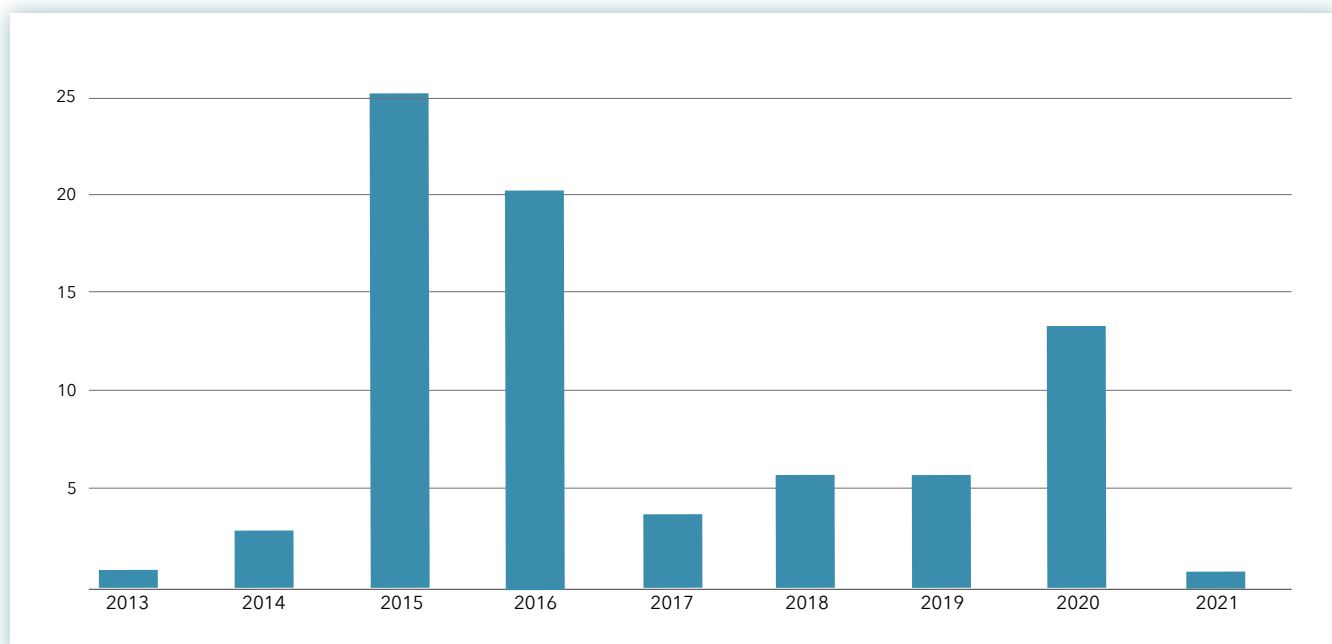
来源: HKFP/HRCChina¹¹

国家安全案件有多普遍？

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s://wenshu.court.gov.cn/>) 是中国法院判决的官方数据库，它并未列出因国家安全犯罪受审者。然而，通过查看人权相关案件的数据，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较低的估计值——尽管这显然只能向我们展示真实全貌的一小部分。

根据保护卫士维护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受害者数据库，在 2013 年至 2021 年 7 月间，数据库所有 173 名受害者当中的 82 人（或 47%）被指控犯有国家安全罪（由于我们没有关于所有犯罪的准确数据，实际的比例可能更高）。在这 82 起案件中，有 10 起是外国人，在我们能够采访到或通过第三方获得信息的所有 44 人当中，他们全部都表示未获准与律师会见。

中国涉及国家安全罪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数量
(2013–2021 年)



数据来源: 保护卫士

中国人权捍卫者 (CHRD) 收集的数据显示，在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6 月 16 日间，在 1,132 名良心犯（大致翻译成我们惯用的人权捍卫者）中，有 50 人涉嫌或以国家安全罪被定罪。另有 349 例未知，约占已知案例的 6.4%。这里的百分比比较低，因为他们还纳入了几百个不涉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例。

警方明显偏好在国家安全案件中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保护卫士取自中国官方来源的推断数据显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应用来对付越来越多人。自从 2013 年推行以来，到 2020 年 12 月止，据认为至少有 26,000 人（也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遭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关押。¹²



国家安全罪以及人权捍卫者

当人权捍卫者以危害国家安全被指控或定罪时，用作证据的各种活动往往荒谬可笑，例如在网上发表批评言论、参加人权研讨会或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这些活动难以合理化以“妨害调查”或导致“泄露国家机密”为借口而拒绝辩护人会见。事实上，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刑事诉讼法》第 39 条中的例外条款似乎纯粹是为了给予警方借法律之名，使他们得以剥夺人权捍卫者的独立辩护人，正是因为指控的虚构性，以至于当局不希望任何外部监督，尤其是来自于经验丰富的人权律师的监督。

[“对话”的政治犯数据库](#)使用了更广泛的人权捍卫者（包括上访者和宗教活动人士）的定义，记录了截至2021年3月31日被关押在监狱或看守所的7,645人（累计自1980年起）。他们将824件归类为与国家安全犯罪有关（其中有44件分裂国家罪，282件窃取国家机密罪，以及102件颠

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占比11%。

虽然无法确定被指控犯下国家安全罪的人权捍卫者的准确总数或百分比（我们估计约占所有案件的6–11%，约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的50%），但很明显的是，这并非无足轻重的数字。

法律途径剥夺: 国家安全例外情况

- 活动人士吴淦在2015年被拘留后被迫等待19个月才获准与他的律师们会面。警方在2015年到2016年间多次拒绝律师会见，曾一度声称他们的委托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与律师会面将有泄露国家机密的风险。会见最终于2016年12月才获得批准。¹³
- 人权律师江天勇在2016年12月无法会见他的律师，当时长沙公安局以江天勇案涉及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其律师的会见请求。¹⁴
- 加拿大人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Michael Spavor）直到被关押一年多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将近六个月，加上看守所六个月，从2018年12月到2020年1月——才获得会见律师的机会。¹⁵
- 公民权活动家程渊、刘大志，和吴葛健雄都是非政府组织“长沙富能”的成员，他们在2019年7月被失踪后的最初六个月被拒绝与律师会见，理由是案件涉嫌颠覆国家政权。¹⁶
- 山东省烟台市警方以国家安全为由，于2020年1月向被拘活动人士张忠顺的律师发出一封信函，拒绝了他和张忠顺的会见。¹⁷

2. 强迫被拘留者接受官派律师

尽管根据《刑事诉讼法》，所有公民都有权会见自己选择的律师，却有越来越多的报导揭发，被拘留者被迫签名放弃自己聘请律师的权利，并转而接受官派律师。一般情况下，官派律师应该只提供给那些没有经济能力或因残疾而欠缺能力聘请自己的律师的人。

警方可能通过威胁来强迫被拘留者亲手写一封信，声明他们已经解雇了自己的律师、并且不希望家人再为他们聘请律师（见余文生，第17页），随后该声明信会被转交给他们原来的律师作为“证据”。

有时，这样的解雇不会有书面信函，仅以口头通知。无论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警察或看守所工作人员都会拒绝律师与被拘留者会见，不予律师确认被拘留者是否确实想要解除委任他们的律师。由于每位被拘留者最多只能指定两名律师，警方通常会为他们指派两名官派律师。通过填补这两个位置空缺，被拘留者的家人或原来的律师就无法与他们会面。

通过采访和在线搜索，保护卫士记录了2015年至2021年8月间82起案件的被拘留者被要求解除委任自己的律师。在这些案件中，超过半数（54起）被拘留者被迫接受官派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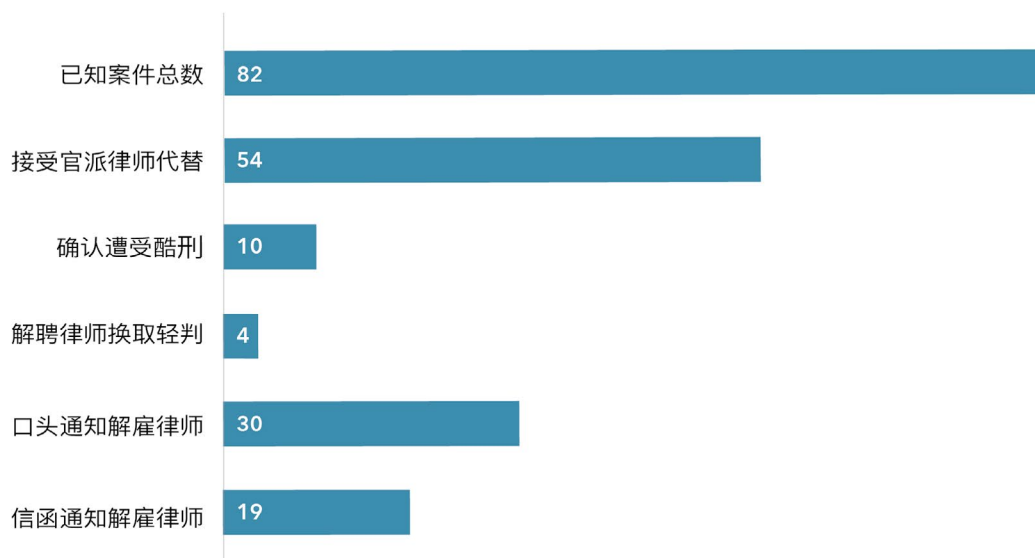
师。虽然很难确定这些案件中的当事人是否遭到了酷刑或威胁——大多数人都恐惧到不敢谈论他们在拘留期间的经历，且许多人也被警方警告不得这么做——在我们记录的案件中，至少有10起案件涉及酷刑和威胁。

在少数案例当中（4起），被拘留者与检察院达成协议，以解除委任他们自己选择的律师换取从轻量刑或保释。在远超过半数的案件中，被拘留者在解除委任律师时无法与家人或律师联系。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被单独关押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或在看守所被单独监禁或无法与外界联系。在大约30起案件中，警方、看守所、检察院或有时是法院仅以口头告知律师或家属，被拘留者解雇了他们的律师。在少数情况下，是以电话通知。在19个案例中，以一封打字或手写（更常见）的信函解聘律师。

当然，由于我们研究的局限性——依赖于媒体报道或愿意接受访谈的受访者，以及关注对象集中在人权捍卫者，实际上被迫解除委任自己律师的人数可能比本研究的数据高出许多个数量级。



中国被迫解聘律师的被拘留者（2015–2021）



来源：保护卫士

法律途径剥夺: 强迫解除委任律师

- **香港书商林荣基** 2015至2016年在宁波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被强迫签字放弃自己聘请律师的权利。¹⁸
- **所有12港人**（一群年轻抗争者在2020年底试图搭乘快艇逃往台湾时被抓获）均被迫接受官派律师。
- **人权律师王全璋** 2015至2018年间不断被施压接受官派律师，但他始终抗拒。最后，他终于在2018年7月——失踪近三年后——会见了选定的一位律师，但这是一位经由当局审查过、认为最不可能“制造麻烦”的律师。¹⁹
- 两名年轻的程序员**陈玖**和**蔡伟**于2020年4月被拘留，他们协助一个名为**端点星**的网站，将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在线新闻报道在未被中国当局查禁之前归档。他们未被允许与家人安排的律师会见，而是被迫接受官派律师。²⁰

预先声明

至少对于人权捍卫者而言，被迫解除委任辩护人已经成了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以至于几年前人权律师和经验丰富的活动人士开始预先录制视频或书面声明，宣称如果在被拘留期间他们解除本人指定的律师，这将表示是由于遭到警方酷刑或胁迫。

保护卫士和其他着力于中国议题的人权组织持续建立着一个数据库，收集当事人预先录制的视频或书面声明，以便在其被拘留且其家属被告知解雇了律师的情况下发布。迄今为止，已经收集了十多份声明。

法律途径剥夺: 预先声明

- 2020年4月被拘留并被迫解雇至少三名律师的活动人士**谢文飞**早前录制了一段视频，声称他宁愿为自己辩护，也不愿接受任何官派律师。²¹
- 人权律师**江天勇**在2016年遭到关押的前几年，就已经公开表示，他永远不会解除委任他的律师和接受官派律师。²²
- **甄江华**在2017年9月被拘留前的一封信中声明，决不接受官派律师为他辩护。²³

在甄江华被居留前，他写了这份预先声明。红色方框中的文字说明，如果被拘留，他将会拒绝所有官派律师。

来源：“南方傻瓜关注群”Facebook页面

本人姓名：**甄江华**
 身份证号码：**440711198001010011**

本人授权委托 **河南轨道律师** 律师事务所 **任敏**
 律师担任本人行政诉讼代理人或刑事诉讼辩护人。

授权权限：代理人进行行政诉讼以及辩护人进行刑事诉讼的全部权限。包括但不限于：针对行政拘留的会见，代理本人就相关行政事项提起行政诉讼（含国家赔偿）。针对侦查阶段刑事拘留、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逮捕后的尽早会见、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经本人同意）等；审查起诉阶段，尽早阅卷、向检察院出具初步辩护意见等；审判阶段，出庭辩护、出具辩护词等；刑事诉讼一审结束后的二审上诉及出庭辩护等。

授权生效：今后自本人被官方以任何不可预知的事由或罪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如行政拘留）或刑事强制措施（如刑事拘留）之时起上述授权委托即自行生效。

授权期限：自该授权书生效之日起至所涉相关行政或刑事诉讼程序办理终结之日止。

特别声明：今后无论受到行政处罚，还是遭遇刑事诉讼，本人都拒绝官方指派的任何律师参与本人的诉讼事宜。
 除本人在自由状态、自由意志下的自行撤销外，本授权为不可撤销。

特此授权和声明

授权人（签字捺印）：**甄江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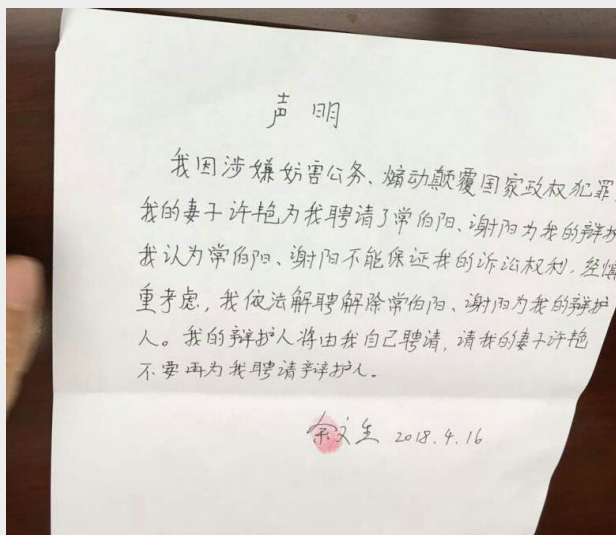
签署时间：2017年8月18日

一封信函和一段视频：余文生的案例

余文生律师于2018年1月在送年幼的儿子上学时被警方绑架。在妻子和律师多次努力尝试与他会见之后，警方于4月制作了一封据称是由余律师撰写并签名的声明，说他正在解除委任其妻子聘请的两名律师，并要求她不得再为他聘请律师。²⁴

这封信写道：

我因涉嫌妨害公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我的妻子许艳为我聘请了常伯阳、谢阳为我的辩护人。我认为常伯阳、谢阳不能保证我的诉讼权利。经慎重考虑，我依法解聘解除常伯阳、谢阳为我的辩护人。我的辩护人将由我自己聘请，请我的妻子许艳不要再为我聘请辩护人。签名：余文生2018.4.16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我永远不会放弃选择自己律师的权利”

他的妻子揭露了这个谎言，她发布了一段他在被抓捕之前录制的视频，声明如果他接受了官派律师并拒绝自己的律师，那代表他一定受到了酷刑。就在警方交出解聘声明后不久，他的妻子许艳就向媒体公开了这段视频，在视频中，他说到：



来源：Hong Kong Free Press

我是余文生，中国律师。今天我要做以下声明，我永远不会放弃选择自己的律师的权利。一旦我需要辩护律师，我已经指定梁小军和张维玉为我的律师，我已经给了他们授权书。如果到时他们无法为我代理，我的妻子有选择我的律师的权利，我永远不会接受一个当局指定的律师，除非我遭遇酷刑。²⁵

官派律师的问题

官派律师，或当局更偏好称之为法律援助律师，均可能在审判前、侦查阶段、逮捕或起诉之后，或甚至在审判过程中，被强制指定给被拘留者。

官派律师是法律援助中心派出的持证律师，或者是派驻在看守所、人民法院的律师。

尽管官派律师是有执照的律师，但由于他们被当局强迫指定给人权捍卫者，并且是被当局所聘用，因此许多人对他们抱有疑虑。他们被视为与警方、检察院和法院站在同一阵线，而非为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而战。正因如此，当局更偏好官派律师。他们想要掌控案件的所有环节，这意味着也要控制律师，以避免包括酷刑或逼供等任何违法行为遭泄露给媒体。虽然人权律师无法如在拥有真正法治的开放社会中那般为委托人有力的辩护——在中国，法院受到政治控制，判决往往是预先决定好的——然而一位优秀的律师能够确保在法律体系内的问责制和透明度至少存有一线希望。例如，在2016年底，人权律师谢阳在遭到拒绝会见律师数月后，终于见到了他的其中一位律师陈建刚。在他们的会面中，陈建刚详细记录了谢阳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的残酷折磨，并且公之于众，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²⁶此外，如果没有中国勇敢的人权律师提供的这些证词和数据，就很难通过国际人权机制来提供证据并借此追究中国的责任。

独立律师在被拘留者及其家人极度担心和彷徨的时刻，向他们提供重要的支持。这些律师扮演被拘留者和家人之间信息流动的渠道，对于维持双方的士气至关重要。律师可以使家人持续了解案件进度——例如审判日期——以及被拘留者的身心健康状况，还可以将支持消息和新闻等外界所发生的事情传递给被拘留者。一旦失去这种连结，被拘留者和家人就彼此完全隔绝了，这将使得拘留成为空有其名之外，实质上则是国家许可的强迫失踪。

“找一个官派律师，他不能依法站在被告人的角度，跟被告人的角度接近一致，那有[律师]不如没有。”

人权律师 任全牛²⁷

官派律师由于未能将必要信息通知家属而恶名昭彰，难以置信的是，甚至包括诸如审判和判决日期等关键信息。2017年，李和平律师的官派律师既没有通知其家属、也没有亲自出席他的审判。²⁸有时，律师甚至躲避家属的电话，并避免和他们见面。在最坏的情况下，当局甚至拒绝提供家属官派律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的情况就发生在“长沙富能案”中被拘留的三位男士的家属身上（请参见第21页）。2020年3月，检察院告知三人家属聘请的律师们，他们已被解除委任，并由官派律师取代，但拒绝透露官派律师的姓名。家属们花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在法律界请求提供信息才终于找到，但当他们试图联系这些律师时，他们却挂断电



话并躲藏起来。这些当事人在2020年夏末遭到秘密开庭和判刑，他们的家属直到一年后才通过其他渠道得知。由于家属并不自动具有探访被拘留亲人的权利（但家属监狱探访是被允许的），律师是双方唯一的沟通渠道，如果被强行指定官派律师，那么他们经常连这个仅存的渠道都失去了。如果家属已经委托了一名或多名律师，则没有理由强制指定官派律师，因为这种情况与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保留官派律师的条件——缺乏资金或能力聘请自己的委托人——并不相符。这也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利益冲突问题——办案机关接管了辩护律师的委任权。

“专案组想操控一切，追求一种迫害的完美。”

人权律师 王全璋

一位替自己的弟弟——端点星案的当事人陈玫争取值得信赖的独立律师的家属这么说：“官派律师基本上是中共当局的走狗，他们之所以涉入案件不是为了保护客户的权利，而是和党合作演一场戏，配合检方和司法机关不透明办案，对政治敏感或人权相关案件的被告迅速定罪判刑。”²⁹



独立律师	官派律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由被拘留者或家属签属委托书自由聘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强迫被拘留者接受，由办案机关指定，产生利益冲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在政治控制的司法系统限制下，尽其所能为当事人的权利而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和当局进行合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提升案件处理方式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揭露酷刑或其他非法手段，并使这些事迹被媒体报道，递交呈件给国际人权机制，借此让中国承担应付的责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协助制造公平审判的假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随时与家属沟通，告知他们被关押者的情况、案件详情、审判信息，以及转达信息，为双向沟通提供重要渠道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很少和家属沟通，拒绝接听家属的电话或与其会面，有时甚至辱骂或威胁家属。他们的身份甚至可能被隐瞒。家属被蒙在鼓里、不被告知开庭时间或判决结果。由于被拘留者和外界家属间没有沟通渠道，被拘留者形同遭到强迫失踪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成为被拘留者的重要支持来源，使他们能够与外界联系沟通，并获知来自外界的支持消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对拘留者没有支持可言

“律师理应能扮演监督者角色，以防止当局的违法手段并纠正错误，从而减少误判冤狱。”

人权律师 程海³⁰



程渊：长沙富能案

长沙富能案被视为当局使用官派律师打压人权捍卫者及其家人最恶劣的例子之一。长沙富能是一个小型非政府组织，由程渊于2016年与他人共同创立，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进行权利倡议，同时通过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的请求来追求政府问责制。



在2019年夏天，警方拘留了三名该组织的成员——程渊、刘大志和吴葛健雄。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的家人和聘请的所有律师都被禁止与三人接触。最初，给出的理由是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后来，在2020年3月，这些律师（其中一位是吴葛健雄的父亲）被告知他们已被解除委任，并由官派律师所取代。这些官派律师从未与家属沟通，最终在2021年夏天，家属才得知三人早在一年前就被秘密审判，后来遭判刑入狱（程渊获刑最重，5年徒刑）。³¹

程渊的妻子施明磊现在和她年幼的女儿流亡美国，她在接受本报告采访时描述了她的苦难经历。照片由施明磊提供。

7月22日早晨长沙国安十几个人冲入我家中进行抓捕。先是6, 7个人押送我带三岁女儿去幼儿园。回到家中就给我戴上手铐，程渊也被戴上手铐，他们开始搜查家里，搜完以后，他们把程渊带走了。随后给我戴上黑头套，

把我带到了街道办事处，在一间屋子里开始审讯。从7月22日9:43分开始，审讯到7月23日凌晨3点左右。期间他们对我宣告了程渊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被拘捕。7月23日下午3点，长沙国家安全局的办案人员再次来我家，竟然对我宣布：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监视居住，而我对程渊的工作根本一无所知。22日夜晚对我审问时，他们让我回家写承诺书。让我保证：不能对媒体发声。在审讯时，他们威胁如果不配合就把我女儿抓来一起审。

“当我们打电话过去给程渊的官派律师，他一听是我，就慌忙挂断电话。9月我们上门找官派律师，他们躲起来不见并要喊警察把家属抓走。”

我的手机、工作电脑、身份证、护照、驾照、社保卡、公积金卡，银行卡，全部被扣押。导致我无法顺利出行，也无法正常工作。我的三岁半的女儿受了惊吓，7月22日下午我在接受审讯，不能接她回家，没有亲人可以委托，只好委托我们教会的师母帮我接。师母接到后孩子在她们家睡了一晚上，师母第二天跟我说孩子晚上一直抽搐和讲梦话。



后来程渊的哥哥程浩去长沙国安局，问到人在湖南省公安厅看守所。但这个看守所十分神秘，没有挂牌，也没有接待窗口，从外面看，像一个民居，住在附近很多年的律师朋友和当地人都不知道这个看守所。

我先生被抓后，我立刻委托了庞琨律师和长沙本地律师张群林，他们随后去长沙国安递交了委托手续，长沙国安接待人员林圣新收下，也经过当事人的确认。但后来长沙市以国家安全名义和案子在侦查期一直拒绝让律师会见。我很担心程渊受到酷刑，每日盼着律师可以会见。

3月16日，侦查期结束的前一周，突然长沙公益仁家属们同时收到他们的6位律师³²集体遭解除的通知。我们是十分愤怒的，而吴有水律师也被亲生儿子“解除”，这个是十分荒唐的。

很明显，是办案单位没有证据定他们的罪，就把律师连同亲老子吴有水一起集体解除了。同时，我们所聘的律师4位都遭到司法局约谈，逼他们退出。

我们的律师们第一时间去检察院递交辩护手续，检察院拒绝接受，说已经有律师了。但官派律师当局拒绝告知我们是谁。因此我们发布了一个声明和一个寻人启事《寻找“雷锋式”的官派律师》，当时湖南的大部分律师都看到这个寻人启事，但是官派律师仍然没有联系过



家属们。直到2020年7月，160多天后，被我们意外发现了4个官派律师。随后我们打电话过去，但程渊的官派律师，一听是我，就慌忙挂断电话。9月我们上门找官派律师，他们躲起来不见并要喊警察把家属抓走。

而抢走吴有水律师为儿子吴葛健雄的辩护权的律师竟然是长沙律协的副会长陈宏义和陈汝超。陈宏义接了吴有水一次电话后再也不接电话了。程渊合法的律师们反复遭到威胁，后来险些被抓，被迫退出。后来我又请了张磊和谢燕益律师。

我自己一直被威胁，要求我不得接受采访，不准将抓捕信息告知任何人，不准离开居住场所，不准未经同意跟任何人打电话，否则就抓捕我。长沙国安称，如果不是我女儿小，他们保证我100%已经在看守所了。



我十分担忧我老公程渊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也会坚持讲述真相，为他们仨呼吁，直到长沙公益仁被释放的那天。

3: 藏匿被拘留者

直接藏匿被拘留者是当局用来阻止律师会见其委托人的一种特别不人道的方式。这种手段相当于强迫失踪，因为连受害者的关押位置都无从得知。在这种情况下，绝无问责性可言，万一这种失踪继续延长，那么家属和亲人也许会担心，被拘留者甚至可能已经死亡。

当局可以透过下列多种方式将嫌疑人强迫失踪：

- 不核发正式的拘留通知书，致使家属和律师不知道被拘留者被关押在哪个看守所。当询问时，警方拒绝透露地点；
- 在看守所使用假名登记被拘留者（请参阅

强制隔绝系列第一册主题“嫌疑人的消失”³³⁾），致使律师尝试会见时，看守所会直接称，没有找到以这个名字登记的人；

- 对于所有牵涉到国家或党的相关案件，几乎形同于当事人会遭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或留置的对待。警方（或留置的案件则是监察委员会）有权使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来隐瞒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地点并拒绝所有律师会见。被拘留者就直接失踪最多可达六个月（有时更久）。截至2021年8月，保护卫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资料库记录在案的**173**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受害者当中，得知**仅有一人**曾经获准与律师会见。³⁴

法律途径剥夺: 被藏匿的被拘留者

- 2015年，关注残疾人士权利的长沙富能组织（见21页）的联合创始人**杨占青**，因为给另一个非政府组织编写了维权手册而被拘留在看守所。起初，警方拒绝告知律师他被关押的地点。“由于警方拒绝透露我的位置，我的律师花了几天的时间才找到关押我的看守所。”他这么告诉媒体。³⁵
- 2019年，警方从活动人士**陈建芳**家中将她抓走几个月后，上海当局告诉她的律师，陈建芳已于上个月遭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正式逮捕，但拒绝透露她被关押的地点。³⁶
- 2021年，被关押在山东看守所的活动家**许志永和丁家喜**的律师被看守所工作人员告知，他们找不到两名委托人的记录，可能是由于他们被以假名登记。³⁷
- 宝鸡市警方带走**常玮平**律师后的第一周，警方拒绝告诉其妻子或律师他被关押的地点（见第29页）。
- **王全璋**律师失踪了将近三年后，他的行踪才被一位他最终获准会见的律师确认。从2015年夏天失踪到2018年7月，警方一直拒绝将关押地点告知他的妻子李文足，因此她非常担心他已经死了。

方法二：针对家属

“常玮平被关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他们]完全是为了制造律师和家属会见障碍。”

遭关押的人权律师常玮平妻子 陈紫娟

值得信赖的家人和朋友是被拘留者的生命线。他们可以聘请法律辩护人，向当局施压以获取案件信息，并在看守所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补给品，例如食物、药品和其他必需品。《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近亲通常是他们的配偶、父母或孩子。他们还可以接受媒体采访，以唤起外界对案件的关注。这使家属成为当局竭力限制嫌疑人获得独立法律辩护的另一个针对目标。

1: 将家属和被拘留者分开

将被拘留者转移到偏远的看守所会使家人提供支持变得困难且成本高昂。有时，被拘留者被关押在距离他们家以及涉嫌犯罪地点数百公里远的地点。例如，在2019年厦门集会（见

第4页）中被抓的活动人士许志永和律师丁家喜，均被关押在山东省看守所，远离厦门市，也远离他们在北京的家。虽然办案机关所在地的确切原因可能很复杂，并涉及其他因素，但当局通过确保嫌疑人与其家人之间维持较远距离，从而加大了提供支持、包括聘请律师的难度。家属必须花费额外的时间和金钱在自身和律师的长途旅程上，需要为他们和律师的长途旅行寻找额外的时间和资金，尤其当许多律师竭尽所能尝试与委托人会面却在看守所门口遭到粗暴拒绝时，这尤其令人心力交瘁。这种额外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家属放弃，并转而接受官派律师。嫌疑人和家属的这种分离也被用以实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正当理由，因为只有在嫌疑人没有自己的住所时才应采用该种羁押方式，否则他们应该被关在自己的家中。

法律途径剥夺：遥远被拘留者

- 人权律师**常玮平**于2020年被关押在凤县看守所，在距离宝鸡市2.5小时危险车程的山区。他妻子认为这是故意阻挠、刁难她和律师。³⁸
- 2018年，人权律师**余文生**被从他居住且起初被拘留的北京转移到700多公里以外的徐州关押。³⁹
- 藏族环保人士**阿亚桑扎**（Anyang Sengdra）也于2018年在他被拘留期间的侦查阶段，被从他居住的果洛州（Golog）转移400公里外的青海省海东市（Tsoshar）。⁴⁰

709案律师妻子们



来源：中国人权捍卫者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2015年夏天，数百名人权律师和维权活动人士在“709大抓捕”中被警方围捕。许多人先是遭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面再接着服刑。为了向当局施压，以告知他们不被允许会见律师的丈夫在关押中的境况，一群失踪的北京律师和活动人士的妻子们(王峭岭、李文足、刘二敏和原姗姗)⁴¹联合起来，开始使用新的策略来吸引外界对他们案件的关注。他们控告官方媒体刊登关于他们丈夫的谎言，提着鲜红色的水桶，在公共场合剃光头发以示抗议，聚集在看守所外，要求获知关于她们丈夫处境的最新消息。她们使全球媒体持续报导这个事件，因此国际注意力得以集中在她们丈夫的困境上。

这些妻子们在2015年夏天之前未参与过人权活动，但国家将她们的丈夫强迫失踪的压力迫使她们成为活动人士。她们因营救行动而受到骚扰、威胁、拍摄、跟踪和软禁，但他们没有被吓退。

警方在该事件中采取了平衡措施：一方面用各种非法手段让这些妻子们保持沉默，另一方面也尽量不采取过分严厉的措施来引起外界对案件的更多关注。在未来的打压行动中，似乎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更加着力于让伴侣们噤声。⁴²



2: 威胁或恐吓家人

恐吓的方式包括在家庭成员家周围安装监控摄像头、雇用暴徒对他们进行肢体胁迫、限制他们的行动、实施软禁，以及发出直接的威胁信息，例如声称他们也可能被捕。警方甚至可能威胁要对他们在看守所的至亲至爱施加更严厉的对待，或者提出协商条件：要求他们答应解除委任律师、

并对媒体噤声，以换取其亲人较轻的判刑。此外，家属甚至可能被迫签署一份声明或录制一段视频，声明他们愿意接受官派律师。有时候，家属若合作，可能换得当局承诺让他们和关押的亲人通电话或会面。

法律途径剥夺：施压家属

- 网络活动人士**凌浩波**的父亲被迫解雇了他为儿子聘请的律师，并录制了视频证词，称他在2019年自愿解除委任该律师。⁴³
- 据朋友们透露，活动人士**谢文飞**年迈的父亲受到威胁，若是不将自己2020年聘请来代理谢文飞的律师任全牛解除委任，他就会被逮捕。⁴⁴谢文飞的母亲签署了解除委任通知。这是警方第三次向他们施压，要求解雇他们儿子的律师。⁴⁵
- 2019年，当活动人士**陈建芳**的律师和几个朋友拜访她父母家时，她父母似乎很怕涉入替自己女儿聘请律师这件事。在那次见面期间，一名自称是陈家亲戚的年轻人威胁要报警。当他们离开时，他们发现一辆警车停在房子附近。⁴⁶
- 政治漫画家**姜野飞**的姐姐被迫解除委任他们聘请的律师，以换取2017年与姜的一次视频通话。在那次通话中，她注意到姜野飞的眼睛周围出现了一条新的疤痕。在家人没有被通知的情况下，姜野飞于2018年7月受审并被判处6年半徒刑。^{47 48}
- 警方威胁活动人士**甄江华**的父母，如果他们不同意解雇甄江华选择的律师，并同意接受官派律师，那么他们的儿子将被判处无期徒刑；若接受官派律师，他就可能获得较轻的刑罚。⁴⁹

常玮平: 消失的律师



人权律师常玮平以承接敏感案件而闻名，包括涉及艾滋病和LGBT歧视、强迫拆迁，和问题疫苗的案件。他于2020年1月在参加厦门聚会后首次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关押（请参见第4页），并于同年10月再度遭到关押，时间点就在他上YouTube发布了一段视频揭露自己1月拘留期间遭警察酷刑对待——连续十天被锁在老虎椅上——之后。

迄今为止，在常玮平于2021年4月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之前，他

的家人聘请的六名律师中，没有任何一位获准和遭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秘密关押数月的他会面。以下证词摘自常玮平的妻子陈紫娟博士于2021年6月接受保护卫士的采访，以及她在网上发表过的证词。陈紫娟居住在深圳，每次尝试去探望她的丈夫或检查他是否从账户取钱以购买基本必需品时，她必须长途跋涉旅行超过2,000公里。

最终，在2021年9月14日，常玮平自2020年10月被拘留以来第一次获准会见他的律师。他的律师形容，常玮平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如何地遭到严重的酷刑和不当对待，以至于只有想到他的妻子和年幼儿子才能够阻止自己尝试自杀或发疯。照片由陈紫娟提供。⁵⁰

我一直不知道常玮平的关押地点，他们没有通知家属地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最初也不愿意给，他2020年10月22日被抓，后来律师去交涉了三天，宝鸡公安才同意给，我是2020年11月1日才收到的书面通知。

他在关押期间的情况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从被抓到现在没有一个律师会见到他。我和律师写的信宝鸡公安都不愿意转交，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信。他被强迫失踪后，家人都很担心他又一次被酷刑，因为他两次被抓都是同一个办案单位：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注：2020年1月时也是这个单位对常实施酷刑〕

常第二次被抓，陕西警方打压律师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而且是从一开始陕西警方就在阻碍律师介入此案。我和他父亲先后聘请了五位律师，前四位律师分别是张庭源、张科科、陈进

学、付爱玲，他们都遭到陕西警方的恶意投诉，都被所在司法局施压退出，甚至张庭源律师只是接受了委托，还没有去到陕西，就被投诉，就被重庆司法局叫去谈话，他总共去了两次宝鸡，第二次去宝鸡是被重庆市司法局追到宝鸡强行带回，以吊销律师证为威胁。回去后，也被多次谈话，最后被迫退出。律师们向我描述，只要去宝鸡高新分局提交了家属委托手续，十几分钟就会接到当地司法局的电话，会被要求马上离开宝鸡。



五位律师多次向主办国保宝鸡高新分局副局长向贤宏提出会见申请，都会被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最近的一次是6月16日，向局长甚至连辩护律师的会见申请都不收了，也不同意转交信件。而且威胁律师不让跟我讲上述事实。否则将遭投诉。

陕西警方从一开始就很忌惮律师介入，11月初某天晚上，他父亲被带到当地派出所，宝鸡高新分局的两位警员要求玮平父亲解除张庭源和张科科两位律师委托关系，如果答应聘请本地律师，就安排他与玮平见面。并且询问请律师的律师费是怎么来的。这些危险让家人更加担心宝鸡公安在玮平一案中的违法行为，更加担心他遭到酷刑。

2020年10月22日到12月25日，陕西警方先后9次到深圳找我，威胁我不要发声，我如果发声，将让我的工作单位处罚我。

[注：2021年4月，陈收到陕西警方的逮捕书，显示常玮平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常逮捕，被关押于凤县看守所。]

凤县看守所非常偏，要翻过秦岭，从宝鸡市区开车过去至少需要两个半小时，路非常难走，车祸发生率很高。我去的那一次就亲眼目睹了一次车祸。但以玮平案子的级别，如果开庭，至少要在中院。宝鸡有诸多看守所，关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完全是为了制造律师和家属会见障碍。我也是宝鸡人，我们想起凤县就是在秦岭山沟里，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的印象，也很少去那里。这次他被关在那里，绝对是内行的本地人想出来的坏主意。律师们飞机高铁到西安，再坐一个小时高铁到宝鸡，再租车开两个半小时到凤县，那个路晚上开更加危险，完全是冒着生命危险办案。



3: 拘禁或使家属失踪

如果威胁不起作用，警察可以直接拘留或使家属失踪，使他们无法聘请律师或与媒体接触。如果家庭成员当中有过从事人权活动的

历史，警方可能会在案件之初就拘留他们，以吓唬来逼迫他们服从。

法律途径剥夺：监禁家属

- 当警方于2019年3月从活动人士**陈建芳**家中抓捕她时，她的丈夫**许建军**也被失踪了。几周后他才被释放。⁵¹
- 2019年**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程渊**被失踪时，他的妻子也被戴上黑头套审讯，然后被安置在她自己家中监视居住。⁵²
- 警方于2020年将人权律师**常玮平**的父母软禁在家，他们的手机被没收，数周之内不允许和任何人见面。⁵³



方法三：针对律师

“我们律师苦苦挣扎着求生存和工作，但空间越来越小，我们几乎难以撑下去。”

人权律师 王宇⁵⁴

当局阻止被拘留者会见独立辩护人的主要目标就是律师本人。自709大抓捕以来，中共就明确显示要清扫人权律师运动。就国际声誉而言，这次大抓捕的代价高昂，而当局现在的注意力似乎更集中在通过将律师资格证武器化来威胁和施压律师不要接人权案件。那些仍在抵抗的人可能会受到失去执业权利的打压。这种策略被伪装成行政处罚，因此与失踪和将律

师判刑入狱相比，较难引人注目。在2016年和2018年出台的关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运作方式的规定越来越严苛，这使得当局更容易注销和吊销法律证书。对中国国内律师的采访显示，这种方法确实正在被日渐广泛与频繁地使用，正在逐步挤压独立辩护的空间。此外，当局也仍继续使用警告、暴力、失踪和在看守所门前设置障碍等更直截了当的工具。

关于律师的法律



律师的行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或律师法）的规范。⁵⁵它重申了《刑事诉讼法》（见第 7 页）中载明的嫌疑人会见律师的权利，并进一步规定：

- 任何被认定有罪（疏忽犯罪除外）或被撤销律师证的律师不得为其委托人担任辩护人（第七条）。
-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持有有效执照、律师事务所授权和委托书的律师有权会见委托人。律师与委托人的会面不应遭受监控（第 33 条）。
- 《律师法》第47至49条涵盖了可以注销（情节不严重）或者吊销（情节严重）律师证的行为。这包括了那些想象内的犯罪，例如企图贿赂法官，但也包括更多定义不清的犯罪，例如“扰乱法庭秩序”、“扰乱公共秩序”、“发表危害国家安全言论”和“泄露国家秘密”。

还有些其他法律、规定和行政措施管理律师的行为，⁵⁶以及看守所发布并张贴在墙上的内部通知等，均对律师与委托人的会见施加了额外的限制。

在这些补充规定中，2016年和2018年分别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⁵⁷，进一步使得律师更加容易受到管控，并且更难扮演独立律师的角色。⁵⁸



这些修订通过下列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律师：

- 要求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与中共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 禁止律师在法庭附近参与抗议活动、对法庭程序进行投诉，和在网上发表关于案件的评论；
- 将为法轮功辩护定为非法；
- 命令律师事务所开除有上述任何行为的律师，否则撤销事务所执照作为惩罚。

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诸如请愿书、公开信或在线会议讨论案件之类的情況成为得以依法惩处的罪行。

2016年，当这些针对律师事务所的规定首次公开时，人权律师批评这些规定限制了他们为客户辩护的能力。因接手敏感案件而被律师事务所开除的人权律师马连顺对媒体表示：“他们通过律所向律师施压，但这将对于人权律师保护委托人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⁵⁹

1: 律师证武器化

通过暂时或永久撤销律师执业证书来弱化律师的力量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但律师们表示，当局越来越惯用这种手段来控制维权工作。这可以从因维权工作而遭注销或吊销执业证作为处罚的律师数量，以及当局出台新规定以便更轻易地管制当中看出。然而，很多时候，当局在没有给出明确理由或甚至是捏造指控的情况下注销和撤销律师证，并且没有受到究责。“政府现在开始利用司法部门和律师协会，而非刑事诉讼，把矛头对准法律从业人员。”人权律师蔺其磊告诉媒体：“他们撤销人权律师的执业证书，这在所有省份都成为趋势。”⁶⁰

当局通过地方司法局和律师协会控制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注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或注销或吊销律师证对个人和事务所都将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并能有效震慑律师承接维权或敏感案件。针对重大或复杂的案件，律师还必须向其事务所报告，并首先向当地律师协会请求允许受理该案件。律师们表示，这项限制最初是不成文的规定，后来逐渐被纳入地方（县区级）司法局的规定，然而，至今尚未成为法律。等待领取首张律师证的新晋律师如果曾参与人权活动或与知名人权律师有联系（例如著名维权律师王宇的丈夫包龙军），可能永远无法获得批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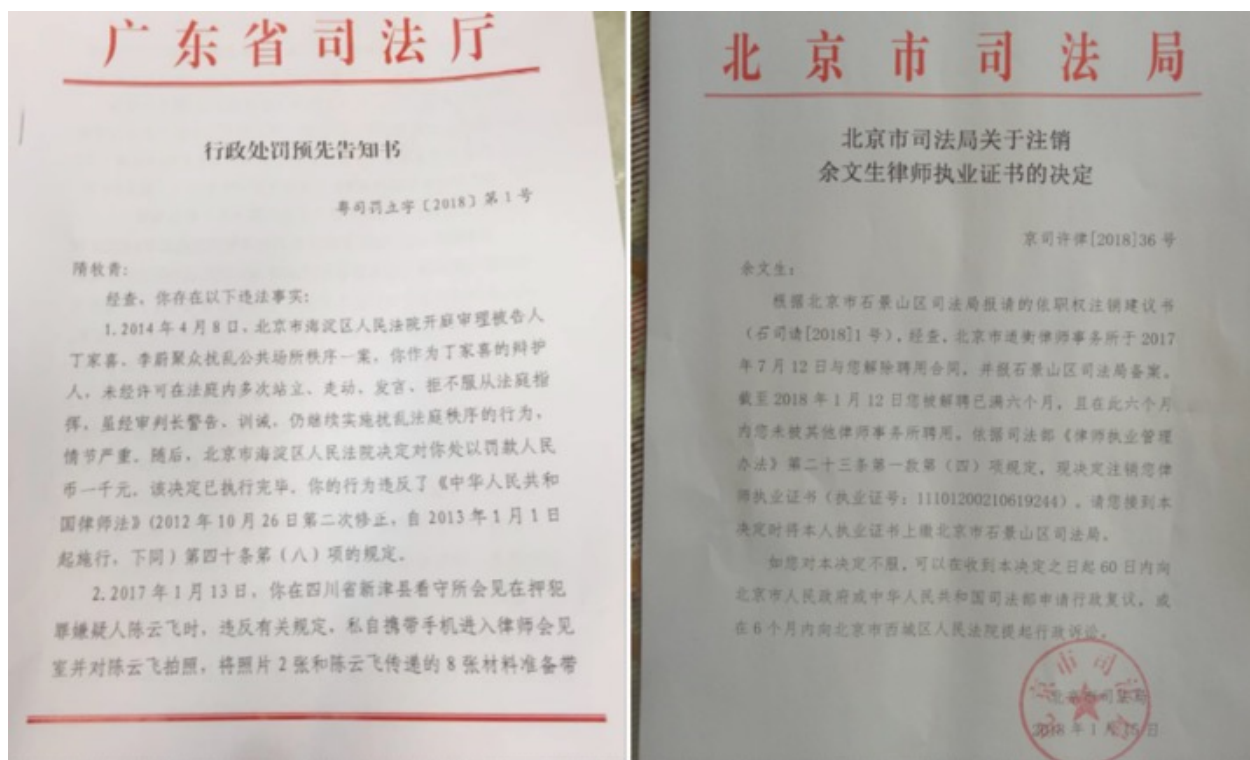
程渊的一位律师庞琨告诉外媒，他不能接受采访，否则可能会被吊销律师证。“我无法判

断接受你的采访是否会被认为是‘炒作’”庞琨说，“由于相关规定禁止炒作法律案件，以及长沙国保的警告，我不能接受你们的采访。”⁶¹

律师证被注销或吊销的律师描述了当局如何违反官方程序通知他们这一事实。违规行为包括：

- 不提供书面通知，仅口头通知律师；
- 在没有（书面或口头）通知的情况下，仅在司法局网站上宣布决定；
- 不告知他们上诉的权利；
- 不给他们上诉所需的通知书；
- 没有充分地解释采取注销或吊销的理由；
- 提供不符合法律的非法或不合逻辑理由；有时在口头通知和后续的书面通知当中提供了不同的理由。

虽然本报告侧重于人权案件，但媒体报道表明，这是一个全面性的问题。2020 年湖南省对商业律师和其他律师的肃清导致1000多名律师失去了律师证（请参见第39页）。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公布了一场研讨会的结果，其中描述了当局对律师证的类似打击（请参见第42页）。



广东省司法局向隋牧青发出信函，通知他的律师执业证书已经被吊销（左图）。北京司法局的一封信函称，余文生的律师证已经被注销（右图）。

来源：中国人权捍卫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当局采用**三种方式**将律师证武器化：

• 年度考核

所有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都必须**每年**（通常在5月或6月）获得当地司法局（与国家控制的律师协会联合）批准盖章的合格证书。任何通过发表言论或接手敏感案件而激怒当局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可能会被拒绝或延迟通过年检，或被标记为“不称职”⁶²，通常不会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或理由。这种精心策划的对人权律师造成的困扰，表面上看来只是简单的行政问题，与强迫失踪或逮捕律师相比，对当局而言是一种低调的解决方式。

《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都提及了年度审查要求。虽然未通过年度考核并不

会剥夺律师接手案件的资格，但实际上却让律师更难承接案件。如果少了盖章，原先已经工作艰难的律师几乎无法查阅法庭文件和会见委托人，因为通常两者都要求律师的执业证有年检章。未通过年度考核的律师也会面临被律师事务所解雇的风险，尤其在当局向他们施压的情况下。如果一家律师事务所未能通过年度考核，它可能难以承接新客户。律师认为年度考核的做法违反中国法律，因为它是由比较下级的机关所发布的规定。

这是一个临时的问题，因为理论上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可以在下一个年度再次申请。然而，他们只有在远离敏感案件的前提下，下一年通过考核的机会才比较大。



• 注销

当局可能决定注销一位律师的证书长达一年。新规则使这种措施变得更容易，并且仅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某些内容即可能导致律师证被取消。若连续六个月未受雇于律师事务所，也可能会遭到注销处罚。一些人权律师抱怨称，司法局阻止他们尝试寻找新雇主只是为了有借口将他们注销一年。未挂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无法有效地担任辩护律师，因为他们缺少了“三证”之一——律师事务所的授权书，导致他们与客户的会面更容易受到阻止。

• 吊销

这对人权律师来说是最糟糕的结果，因为根据中国法律，他们可能永远不能再执业。《律师法》第49条列举了司法局可以吊销律师证书的理由，包括“扰乱”法庭或公共秩序、在网上发布某些信息等行为，从而终结他们的执业律师生涯。

施压律师事务所

司法局还向律师事务所施压，要求解雇或不聘请特定律师。如果律师未与律师事务所挂靠，他们可能难以接手案件，六个月后可能会因为未挂靠律师事务所而失去执照长达一年。2018年，人权律师张凯因当局强迫其所在的北京新桥律师事务所解雇他而失业。

⁶³ 2017至2020年间，至少有五名人权律师被强迫离开他们的律师事务所：彭永和和李明（2017）、张凯（2018）、任照（2019），和王胜生（2020）。



失去律师证：让中国律师噤声的三种途径

(1) 年度考核 (暂时)：

在每年五月或六月期间的执业年度考核，司法局拒绝或延迟通过律师执业证年度考核，或在证上标记「不称职」，让律师难以、或完全无法为其委托人辩护，并让他们面临被律师事务所解雇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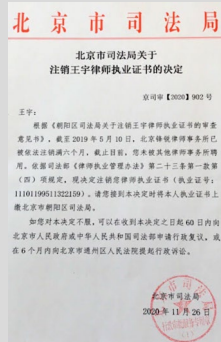
2017年，四位著名人权律师，包括蔺其磊、覃臣寿、余文生，和梁小军年度考核未通过。四人皆为709大抓捕受害者的辩护律师。

余文生律师

(2) 注销 (暂时)：

司法局可以为了轻微的违规行为—诸如在网上发布言论—而注销律师证长达一年，或者施压律师事务所，强迫其解雇或不得雇用某位律师，而这位律师倘若无法在六个月内找到另一家雇主，他的证书就会被注销。

2020年11月，以709大抓捕第一位受害者著称的人权律师王宇被告知，她的律师证已遭到注销，理由是她至少六个月未受雇于律师事务所。她原先的事务所—锋锐律师事务所—已经被中共当局在2018年注销。「我无法找到另一家事务所雇用我，因为司法局要求他们不可雇用我。」王宇说。



司法局注销王宇律师证的信函

(3) 吊销 (永久)：

司法局基于「扰乱」法庭或公共秩序，或在互联网上发布言论等违规行为而吊销律师的执业证书，终结他们执业律师的生涯。



在2021年初，两位著名的人权律师卢思位以及任全牛，即在尝试代理「12港人偷渡案」中的当事人后几周内，接连被吊销律师证。在遭到吊销执业证书之前，任全牛律师曾说：「国保多次警告我，如果不撤出此案，他们会吊销我的律师证。」

任全牛律师

王宇：有些办案警察非常蛮横



王宇是中国备受尊敬的人权律师之一，也是众多人权奖项的获得者。她最著名的案件包括为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2014年因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曹顺利（一位女权捍卫者，同年在看守所中死亡）进行辩护。

王宇是2015年夏天“709大抓捕”当中第一批被带走的受害者之一。她被关押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看守所的一年多时间内，均未获准与律师会见。王宇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但从未在法庭受审，其于2016年8月同意在电视认罪中

露面后获准保释。当709大抓捕打击的主要对象锋锐律师事务所被关闭后，王宇无法找到另一家律师事务所雇用她，因而最终在2020年11月被当局注销了她的律师证。

今年(2021)代理的广东茂名的牛腾宇案件（一位由于在网上发布有关习近平女儿个人信息，而被判刑14年的未成年人），我被多次以各种理由拒绝会见，被拒绝会见的理由主要就是律师证没有年检，没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函，或者公民身份辩护人不允许会见。没有新方法，都是老方法。被拒绝会见当事人是对当事人辩护权的侵害，使当事人处于无法获得辩护或者辩护权受损的状态。

在中国大陆，警方拒绝律师与当事人会见的情形越来越普遍。但是应该说并没有新的方法，主要还是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还有一些案件的办案警察非常蛮横，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允许会见。

我的执业证被注销的原因是：根据法律，锋锐律师事务所被注销超过半年，没有找到新所接收，就被注销。是北京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员电话告知，并邮寄了相关的关于注销的行政文件给我。而事实上，我是被司法局限制，有律师事务所被告知不能接收我。所以我无法找到新所接收，另外，还有就是官方通过网上特殊设置，使我无法在网上申请转所。我已经开始进行信息公开和行政复议等法律程序，但是目前我的法律工作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执业证被注销之后，从法律上的规定来说，还可以重新申请执业。但是，事实上，目前有一大部分被注销的目前都不可能重新执业了。

问题的严重性

根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提供的数据和媒体调查，2016年以来，至少有35名维权律师因维权工作而被注销或吊销执业证书。有关他们的姓名列表，请参阅附录一。

许多被吊销律师证的是“709大抓捕”的受害者，或是为那些被抓捕的人辩护的律师。

律师大清洗

2020年夏天，据称湖南司法局以“律师不得持外国护照”、“为多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或“从事非法律兼职”等规定为由，吊销了数百名律师的证书。虽然并非直接针对人权律师，但在4月至8月间，这场运动在湖南清除了1,200多名律师，显示了当局控制律师证书的范围和深度。⁶⁴

单单在2021年1月，就有五位律师——任全牛、卢思位、周泽、彭永和，和裘祥栋的律师证遭到注销或吊销。

- 如同任全牛（见第 46 页），在试图代理 12 港人案当中的一名被告仅仅几周后，**卢思位**在 2021 年初失去执照。官方原因是“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但卢思位认为，他尝试代理 12 港人案才可能是真正的原因。⁶⁵
- **周泽**律师于 2021 年 1 月因在网上发布视频，据称是曝光警察对其当事人和证人实施刑讯逼供而遭到注销律师证一年。他发布的材料“与非法审讯和刑讯逼供有关，因

此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来看都是完全正当的”他辩称。

- 前检察官转任人权律师的**杨斌**在2020年8月被告知，由于自2019年5月以来没有受雇于律师事务所，因此她的律师证被注销。她先前在广东的律师事务所拒绝续签合同，因为她拒绝删除一则关于农村维权案件的帖子。虽然找到了一家北京律师事务所聘用她，但提交给北京律师协会的申请却被搁置了数月。⁶⁶她的工作涉及维权案件以及活动人士许志永在她家躲避警察的事实可能是其律师证被注销的真正原因。
“我现在觉得很无助，这种情况很荒谬。我的执照被取消……是因为在中国言论自由欠缺保护”她说。⁶⁷
- 2020年8月，**谢阳**被当面告知，由于在2017年被定罪，他将遭到吊销律师证，尽管这一裁决违反了他当初受审时达成的认罪协议，还违反了中国的一条关于诉讼时效的法规，该法规定不得对超过两年前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身为“709大抓捕”受害者的谢阳曾与当局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他承认犯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公开宣称其前律师关于他遭受酷刑的说法是虚假的，那么他就不必服刑，也允许保留他的律师证。当谢阳收到书面通知，却得到了不同的理由，指控他扰乱法庭秩序，但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具体细节。⁶⁸

“他们只是在编造借口来惩罚我。”

律师 谢阳



中国律师后俱乐部

2018年，被吊销律师证不久的人权律师覃永沛为那些和他一样受迫害的律师成立了一个支持团体，这个团体称为“中国律师后俱乐部”，这可以显示有多少律师正在失去他们的律师证。该俱乐部成立于中国南部广西地区的南宁。它成立的目的是帮助数十名人权律师找到工作，这些律师在被剥夺了出庭代理委托人的权利后，为了生计而辛苦挣钱。它的成员包括文东海、王宇和隋牧青等。不幸的是，2019年11月，在覃永沛本人被拘留后，俱乐部被迫关闭。^{69 70}



系列报告
强制隔绝



一月内三律师遭吊照 专家忧中国维权空间不再



曾为十二港人辩护 律师蔺其磊遭注销执业证



余文生律师证被注销 称遭政府“打压报复”

大紀元

执照遭注销 维权女律师王宇：劣币驱赶良币



中国进一步打压维权律师 法律公正空间恐“越来越少”



709案维权律师出狱后又被剥夺执业资格

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威胁吊销12港人自聘律师执照



2: 官僚障碍

看守所工作人员有无数种运用接口和谎言把律师阻挡在门外的方式，使律师难以或无法会见被羁押在内的委托人。即使确实存在妨碍律师与委托人在特定时间会面的问题，看守所也有法律责任在48小时内安排新的会面时间。他们采用的方法包括：

- 每当律师试图安排会面时，用正在接受审讯来阻碍律师与客户的会面时间；
- 要求额外并不总是符合法律的授权来无限期地推迟会见，例如更新的委托书、当地律师协会的许可、委托书的公证等；
- 声称没有空的会见室或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一些看守所故意将会见室的数量限制在与关押人数不成正比的程度；
- 只允许有限数量的会见时段。一些律师表示，会见时段稀少到有时候都被私下交易掉了；
- 不允许在周末会见、午餐时间不让会见、看守所早早关门，例如下午4点，以及；
- 采用的线上预约系统无缘无故取消会见。

余文生律师在2018年被拘留时，他的妻子和律师在其受审前关押的两年间从未能够与他见上一面。看守所的工作人员用十多种不同的借口搪塞他们。被拘留的教会成员张春雷的律师们被告知无法会见当事人的重复借口，包括他2021年7月正在被“审讯”当中。⁷¹

并非只有在人权案件当中，律师才被阻止会见当事人。2018年，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主流律师事务所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讨论各类律师在看守所会见客户时遇到的各种困难。⁷² 他们的经历与本报告当中列出的人权律师的经历相似，包括使用假名在看守所隐藏嫌疑人身份；强迫嫌疑人解雇他们的律师；以及当嫌疑人被关押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下时，阻止所有的会见。从最初的拘留、调查阶段到实际审判，都发生了阻碍律师与客户会见的情形。



看守所大门的拒绝

2018 年至 2020 年间，被聘请替人权律师余文生辩护的律师们多次试图到两个看守所（首先是北京，然后是江苏省徐州市）与他会面时，中国当局给了他们至少12种不同的拒绝借口，其中许多是捏造或非法的。律师们从未获准见到余文生。*



1 查无此人（可能被以假名登记）**

2 请出示书面文件（从没给过任何文件）

3 周末不上班

4 要等我们通知才能见他

5 我们得请示领导才知道为什么不允许

6 只有一位律师约了，不能二位辩护律师一起进去

7 你的文件内容有误

8 余文生的案件在办理移交手续，移交过程中不能会见律师

9 需要先由办案人员批准

10 办案人员不批准

11 他解雇了他的律师，他不希望你替他委托任何律师

12 他已经有官派律师，其他律师不许见他

* 根据保护卫士在2020年对余文生的妻子许艳进行的访谈以及媒体报导

** 可能因为余文生被以假名登记。请参阅强制隔绝系列的第一份报告：《强制隔绝（一）：嫌疑人的消失》

3: 干扰会见

保护卫士对中国境内的律师进行了匿名调查，以了解他们在看守所会见委托人时如何受到干扰。律师们抱怨称，即使他们被允许会见委托人，看守所也故意干扰会见。《刑事诉讼法》第 39 条规定，辩护律师与嫌疑人之间的会面不得受到监控，但律师们抱怨，有时警察会现身会客室当中。他们还称，会客室经常被故意弄得脏乱、太热、太冷，或太吵以至于难以交谈。有时，客户和律师之间用一张厚铁丝网隔开，使彼此难以交谈、见到对方的脸，以及出示文件。有时，看守所会无缘无故缩短会见时间。

4: 新冠肺炎期间的限制

2020 年 1 月中国正式承认新冠肺炎爆发后，所有被关押在看守所的被拘留者都停止会见律师，以避免病毒传播。数月后疫情得到控制，封城禁令逐渐放宽，看守所开始慢慢允许律师进入，但必须在更严格的条件之下，而疫情控制往往被作为全面拒绝的理由。

当然，试图代理人权捍卫者的律师面临了更多困难。他们称，看守所推出的新冠肺炎疫情防范措施因设施而异，也因地区而异，规则很不透明。例如，新规定往往只在网上发布，造成混淆。他们也谈到，就算在中央政府下令放宽限制之后，个别看守所仍继续剥夺被拘留者和律师之间的探视权。一些新的限制包括：

1. 律师必须通过电话要求与客户会面，但这些号码经常连续几天无人接听。
2. 一次只允许一名律师会见客户，在过去，一次允许两名律师会见。

3. 仅允许视频会见，但是音频和视频的质量太差，以至于律师很难与委托人沟通。
4. 律师在获准会见之前，必须提供新冠检测阴性证明。
5. 某些看守所坚持要求律师穿着全套个人防护装备来与客户会面。
6. 除非临近审判日期，否则不允许会见。
7. 会见时间长度和频率受到限制。

尽管当局通过实施新冠防疫措施以保护人们的健康，尤其在诸如看守所这样拥挤且病毒可能迅速传播的地方，是合理且必须的，但这不应该代表能够任意侵犯被拘留者的人权。当无法进行面对面的会见时，应当推行视频会见，并拥有够高的通话质量，以确保视频会见对律师和委托人的有效性。作为一个科技威权国家，难以想象中国竟然没有高质量视频通话的技术。一旦条件许可，律师理应恢复面对面的会见。

有许多记录在案的案例显示，被拘留者因新冠防疫措施而被拒绝与律师会面。例如，在 2020 年 6 月，即疫情爆发仅五个月后，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发现了 12 起案例以疫情为借口，不允许被拘留者接触律师或家人，甚至不允许在线联系的案例。⁷³ 美国篮球运动员杰夫·哈珀(Jeff Harper)于 2020 年在深圳被非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长达八个月，在前六周中国正竭力遏制新冠疫情时，都没有见到他的律师。哈珀的女朋友在提到他的律师时说：“她花了很多时间才能见到他，才获得批准。”“她去了三、四次要求会见都被拒绝。最后她终于被允许入内，之后才开始获准比较规律的会见。”⁷⁴



法律途径剥夺：以新冠疫情之名

- 2021年1月，警方基于新冠疫情防控措施，阻止被关押律师**常玮平**的律师们与他的父母（当时处于被软禁中）会面。他们被带到了酒店房间，尽管当时在中国该地区没有爆发疫情。第二天，他们被迫返家。⁷⁵
- 2020年5月，当活动人士**谢文飞**的律师试图与他会面时，他被告知首先需要提供肺部断层扫描、新冠病毒阴性检测结果和手机app上的绿色健康码。⁷⁶ 2020年9月和10月，他家人聘请的新律师们再次遭到以疫情为由拒绝会见谢文飞。⁷⁷
- 2020年6月，上海看守所告诉活动人士**陈建芳**的律师，他无法会见她，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规定在每个调查阶段只允许一次律师会见，而她在2019年9月已经有过一次会见。⁷⁸
- 2020年4月，被监禁的藏语活动家**扎西文色**被阻止与其律师会见，理由是所有律师会见都因为新冠疫情而被取消。⁷⁹

任全牛：想从事诉讼业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南省人权律师任全牛为了摆脱出身农村的贫困生活而开始学习法律。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他致力于为强拆受害者、受迫害宗教人士（包括法轮功）及活动人士代理案件而闻名。

“709大抓捕”期间，他受雇为法律助理赵威辩护，但却从未获准与其会见，他本人还由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对她在拘留期间遭遇的担忧后被短暂拘留。2020年，他受雇代理公民记者张展（

已知的第一位因报导武汉最初的新冠疫情爆发而被判刑者，并因此而闻名）和黄伟然（12港人案的当事者之一），但未获准与任何一位委托人会见。任全牛的律师证于2021年2月被吊销，他的律师事务所也被迫解散。

2015年我代理赵威案的时候，始终没有被允许会见。刚开始官方根本不通知家属，不知道人关在哪儿。后来根据蛛丝马迹，去了几拨人，才问出来，是天津下面的河西区公安局承认在办案，实际背后是公安部和天津公安局在做，只是找到下面的一个分局在接待而已。一开始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不让会见，到后期，转到看守所很长时间了，快到我们被排除的那时，看守所接待我们的那些警察说赵威在里面聘请了两位律师，因此家属聘请的律师就不再接待了。

我被抓是因为有人故意给我打电话，说赵威可能在里面被性侵了，我并不知道这个消息真假，就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关于这个消息的帖子，我没有说被性侵，只是说赵威可能遭受人身侮辱，希望关注的网友去找官方律师核实……我发了这样一个内容，他们即以我造谣，涉嫌寻衅滋事把我拘捕了一个月。实际上，拘捕期间，他们问的问题也是我之前办过的很多所谓敏感案件，不止是所谓造谣赵威这个事情……我认为他们是在做一盘棋，在709案一周年的前一天，把我抓了，来引导舆论，并攻击709的辩护律师。

〔在12港人案中〕我代理的是黄伟然，不到30岁，他母亲委托的我。一开始并不认为这个案件有多敏感，因为只是一个有关偷越国边境的案件。我尝试会见了两次。第一次拿着家



属的委托书和录的委托视频（以防他们不认）。果不其然，他们根本不看委托视频，只是表面上看了一下委托书，说，委托书没有公证，而会见需要有公证，实际上在中国的法律里面没有这个规定，只有外国人犯罪才需要公证，我问过一些当地的同行，在以往的广东地区办理涉港案件，多数也是不需要公证的，但是这一次，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说需要有公证，否则不接待。过了一段时间，家属在香港花了几万元港币做了一个律师公证，第二次拿去仍然不让见，这次说他本人在里面已经请了两名律师，因此家属请的律师就不能介入了。本人请的律师优先，但本人是否真的请了律师，我们想核实，他们也不允许，在法律上这一块属于空白，没有说我们能否核实，也没有说禁止我们核实，所以权力在他们手里，以这种方式将我们排挤出去了，不允许核实，也不允许会见。

在代理案件过程中，有我所在的司法局，国保，律师协会等一直在施压，要求我必须退出，我也一直在拖延。因为我要求他们告诉我请的两位律师是谁，给家属一个说法。他们根本不理睬，只是强令退出，我要求他们下书面文件要求我退出，他们也不下。中间也有国保提过几次，说弄不好就吊销我的执照，我当时不以为然，觉得这个案子没有那么敏感，再说我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公开相应的东西，只是就不被允许会见做了采访，但这也未被他们允许，威胁了很长时间，也也没有退出，但由于压力很大，后来也没有更多的接受采访或去深圳本地〔黄被关押的地点〕。

前几年，法治环境不是那么糟糕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地方办案机关（比如信仰案件），有的地方比较宽松，律师正常会见，有的地方，国保随便给看守所下个文，交待几句话，看守所就不让会见了，律师得去找国保，或者控告，但效果都不是很明显，总的来说很随意，各地不等。对于维权人士案件，一般如果不是与危害国家安全有关的，一般会见都没问题，只要是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颠覆国家政权相关的案件，几乎在侦察阶段一律不予会见，理由是有碍侦查，不管这个案件是否在侦查，是否有碍侦查，总是不让会见，这个在法律上有规定，但并没有禁止会见。在实践中，他们实际是禁止了会见这个行为。在法律上是说需要侦查机关批准，并没有规定他们一律不批准，现实中，他们就滥用这个权力，一律不批准会见，这个实际上也是不符合立法的本意。

还有一些地方，政法委给看守所一个通知，要求外地律师到当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时，到当地律师协会再开一个律师执业证有效的证明才允许会见，这也是很荒唐和违反法律的。

不过多数情况拒绝会见的理由是，案件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有碍侦查不让会见。还有一种是近年新兴的，在敏感案件中，他们会以当事人自己请了两名律师为由而拒绝律师会见（因为两名律师是当事人可聘请的律师上限）。

这几年确实整个司法是在倒退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要不做法治或政治改革，如果不想改革，不想权力分散，当局只能是更加收紧手中的权力，那就必然对民间的维权人士和律师



进行党化教育，必须得听话，自觉的不碰，不说，不讲，这也是一个倒退的根本原因。

我是1月4日（元旦后第一天上班）接到司法局通知，找我的主任约谈。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实际上当天上午听到成都卢思位被吊牌的通知，下午接到这个通知。2月2日即做出了吊证处罚，表面上的原因当然不是12港人案件，而是2年前我在四川做过一个法轮功案件，说我有不当的言论“多次否定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性质的行为”，实际上在法律上是说不过去的，是个莫须有的理由。国家法律没有认定法轮功属于邪教的文件，他们却说我否认了这个所谓的认定，另外我也只是在法庭外交给法官的辩护词说了法轮功不属于邪教也没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也不属于违法犯罪，就这辩护词内容司法机关说“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实属莫须有的迫害。后来郑州律师协会的一个负责人传达了司法局的意思，要求我们所解散，实际上根据法律规定，我被吊证后，我们所可以增加一个合伙人，该所还是可以继续经营的。但他们有备而来，不按照法律程序让我们加入，让所有人都转走，把所的名字注销，让名字彻底消失，这就是他们的手段。

“国保中间提起过几次，说如果我不退出这个案件就吊销我的执照。”

被吊照之后当然我就不能再做执业律师了，加上近几年国家的法律中对公民代理有了更严格的限制了，被吊牌的律师做刑事案件是被绝对禁止了，在民事和行政案件中，也是很严格的限制了，所以说对我的影响是很严重的，想从事诉讼业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其他方面如何做，我还没有摸索出一个路子来。



5: 会见条件

有时，警方会允许他们认为不会制造“麻烦”的人权律师会见他们的客户，前提是同意某些条件，这通常意味着不公开任何案件细节，以及说服他们的客户认罪。用王全璋的话来说：“这基本上和官派律师一样了。”

换言之，律师必须同意与警方和检察官合作，而非为他们的委托人而战。与官派律师相比，拥有如这般无声人权律师的唯一优势是，他们依旧可以为被拘留者与其家人提供一个沟通渠道。

法律途径剥夺：对警方的承诺

- 遭关押的谢阳律师的辩护人之一**张重实**与警方达成“秘密”协议，答应说服谢阳认罪后，在2016年11月（谢阳被拘留约一年四个月后）终于获准与他会见。⁸⁰
- 2016年12月，在谢阳的另一位律师**陈建刚**答应不会公开关于案件的任何信息之后，警方准许他与谢阳见面。⁸¹
- **刘卫国**律师与法院签署保密协议，称不会公开案件的任何细节，也不会接受媒体采访后，于2018年7月获准会见在押的王全璋律师。

法律分析

国内法

拒绝被拘留者会见法律辩护人违反了中国的一系列法律和规定，这些法规涵盖了嫌疑人会见律师的权利以及律师为其委托人辩护的权利。

妨碍律师会见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九条。《刑事诉讼法》规定，每位嫌疑人最多可以聘请两人作为辩护人，并且必须在嫌疑人提出会见请求后的48小时内安排与律师会见。此外，从第一次讯问或拘留的第一天起，嫌疑人就应该被告知这一权利。第三十九条规定，案件若涉及国家安全犯罪的嫌疑，嫌疑人并不自动享有此项权利；在侦查阶段（即在案件移交检察院之前），任何会见都必须先得到警方或同等机构的批准。然而，这种例外已经成为中国警方的常态，在这些情况下，他们经常性地拒绝批准，中国律师们批评这种做法违反立法本意。

在中国，看守所的运作受到《看守所条例》⁸²的约束。此外，中国法律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⁸³来规范看守所程序。《看守所执法细则》⁸⁴对《看守所条例》进行了补充，该细则是2010年出台的内部文件，部分是为了回应外界对看守所内犯人待遇的批评，尤其是在几起中国嫌疑人于拘留期间死亡的丑闻被广为报道后。⁸⁵由于看守所条例已经30年未经修订，它在人权保障方面已经明显过时。公安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概念和结构也比较简单，缺乏基于人权或被关押者基本权利的相关考量。2010年的《看守所执法细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时的《看守

所条例》的不足和漏洞，但它也凸显了司法过于着重在“权力者”——即警方——而非侧重法治的问题，这在中国的羁押和司法体系当中是根深蒂固的。人权状况如此恶劣，以至于2019年一位省人大代表要求司法部从警方手中接管中国看守所的管理权，以便加强维护被拘留者的权利。⁸⁶

阻止辩护人或律师行使会见客户的法定权利违反了《律师法》。⁸⁷该法第33条规定任何律师都有权会见委托人，无论他们被关押在看守所或是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只要律师持有三证——有效的律师证、律师事务所授权书，和委托书。此外，第10条规定，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要求他们从律师协会取得额外的跨省承接案件许可是违法的。

《看守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和《看守所执法细则》还详述了律师有权利预约会见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客户。其他辩护人则可以请求法院、检察院许可会见被告。此外，根据《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⁸⁸看守所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会见顺利、安全地进行，允许一到两名律师在场，也允许一名律师助手陪同。看守所必须当场安排会见，或者如果无法安排，必须在申请后**48小时内**安排会见（第7条）。

律师的独立性

新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18）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16）两部新规



定进一步侵蚀了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独立性。新办法规定，事务所必须拥护中共和习近平的领导。此外，律师事务所必须要么设立党组织、要么允许党组织参与事务所的运作和决策。这些新办法还要求律师事务所更密切地监控员工的案件和行为，包括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言论。律师事务所必须解雇公开案件细节或组织公众表达对其委托人支持的律师。律师事务所如果没能约束好受雇律师，可能会失去它的执业许可证，因为新规定要求司法机关对律师事务所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日常监督。⁸⁹

国际法

阻挠被拘留者会见法律辩护人完全地侵犯了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主张：“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⁹⁰获得公正审判权意味着无罪推定，因此要求维护被拘留者的权利，例如获得律师辩护权。《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规定，除非在少数例外情况下，“不得终止或限制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授受其法律顾问来访和在既不被搁延又不受检查以及在充分保密的情形下与其法律顾问联络的权利。”⁹¹此外，该原则亦主张，被拘留者“与外界，特别是与其

家属或律师的联络，不应被剥夺数日以上。”获得公正审判权（仅在所有拘留中的权利都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出现在无数国际条约、各国惯例和法理学当中。它是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无论条约是否被批准生效，对各国都有约束力。例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将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描述为“人权保护的一项关键内容，是保障法治的一项程序手段”。

剥夺嫌疑人会见律师的权利，会导致他们面临更大的酷刑风险。酷刑是如此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没有任何情况可以作为容忍这种做法的借口。用以惩罚或威胁接手敏感案件律师的措施，诸如殴打、拘留、注销或吊销律师证，都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⁹²该基本原则第16条规定，律师应“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不适当的干涉”，并且应“能够在国内以及国外旅行并自由地同其委托人进行磋商”，以及“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胁会受到起诉或行政、经济或其他制裁”，《基本原则》第7条和第8条也涵盖了所有被捕者都应享有的权利，即“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

王全璋：拒不认罪的律师



在“709大抓捕”期间，人权律师王全璋是唯一一位因拒绝认罪和接受官派律师而被单独关押近三年的受害者，他并以此闻名。王全璋最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四年徒刑，最后于2020年获释，与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团聚。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维权律师，曾为法轮功修炼者、记者和活动人士辩护。由于刑事定罪，他的律师执业证被吊销。

其实从2016年上半年，专案组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注：王全璋于2015年夏天被抓〕，我在被羁押期间的待遇也有所改善……专案组的人员感觉更没有必要继续关押我的必要，他们开始暗示我，并和我谈判，只要我配合他们就会很快得到释放。⁹³

但是我的心态发生逆转，完全不配合他们，他们无法按照原先的剧本表演下去。

我自己很清楚，我的案子只要全部的公开，专案组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因为在逻辑上不成立的，天津无法面对任何媒体〔注：涉及该案的办案机关在天津〕，甚至他们自己的官方媒体都不敢面对，何况我的律师，一旦我的真正的律师介入，将这一切公开，那么，天津无法收场，所以他必须找一个听话的服从他们安排的律师，这就是这么多年他们不让我会见我想见的律师的原因。

其实，在我被关押期间，我被安排会见了六七名律师，但是都被我拒绝。这些律师的唯一作用就是配合表演。因为我在我的数个信任律师被拒绝之后，我放弃了要求律师，我要求亲友辩护人参与辩护。专案组无计可施，一方面他们声称保障我的辩护权，一方面又拒绝我的律师会见，没有辩护人他们又无法开庭⁹⁴，在2018年审限到期的时候，决定跟我商量无辩护人的情况下开庭，我因为当时感觉审理期限一旦届满，他们必须变更强制措施，我



到期会被释放，因此我必须以变应变，决定增加辩护人拖过审限，我选了四个律师，法官从这四个律师中找了一个最可能跟他们合作的律师就是刘卫国律师。

因为我完全拒绝了法院安排的律师，也就是所谓官派律师，法院又想表演下去，必须给我找辩护人，坚持了将近三年他们开不了庭，他们就要退步，到了2018年，他们的压力空前，不得不告诉我，全国任何一个律师我都可以选，只要我选，他们就帮我找，这对我来说，是抗争的一个进步。

法院真正害怕的律师是比如程海、比如亲友辩护人……，他们最终选择了他们认为可以掌控的律师，因为这个律师和法院签订了一个所谓的保密协议，这个保密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不披露案情，不接受媒体的采访。这实际上跟官派律师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了。

我见到刘卫国律师，首先告诉了他的意图，我的想法，我希望他能够找个机会退出我的案件，这似乎很矛盾，一方面我要求他做我的辩护人，一方面又要求他退出辩护，这不是很奇怪吗？这其实源于我的认识，源于我的辩护技术。刘卫国律师并不是我最想请的律师，我在那个时间请律师的原因就是为了拖住法庭开庭的时间，寻求到期我被释放。因为法律规定，如果到期不能审理结束案件，必须对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

很多年来我办理案件，形成一个认识，就是，有效的辩护，不是辩护词写的有多么好，而是增加公检法的违法性，特别是法院，只要法官违法了，案件就有好的发展。

但是刘卫国律师不愿退出辩护，不愿承担风险，跟我大吵大闹，非得要求我解聘他，我解聘律师和律师退出辩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虽然在结果上看上去好像一样，我没有辩护人了，但是法律指向却完全不同，我解聘律师被认为是玩弄法院，出尔反尔，自己不想要辩护人了，法院似乎也可以不再帮我找辩护人，而如果律师退出，则是律师的原因，法院还要保障我的辩护权。

我的妻子为我申请的律师，我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法院也不会告诉我。

〔为了阻止我与自己的律师会见〕他们威胁判我十年，威胁把我的妻子抓起来，他们在不同的阶段变化不同的威胁方式，他们甚至连我妻子给我存钱存物都不让我知道，暗示已经没有人管我了，暗示我的妻子被抓起来了。

专案组想操控一切，追求一种迫害的完美，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三一致”：立场一致，行动一致，目标一致，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跟他们唱反调，这个对公检法来说很容易，但是对律师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律师天生就是唱反调的，因此他们不想在律师这个部分上出现失控的状态，因此，他们就要控制律师的选择。



在中国，常常是人被逮捕了很长时间后，才被检察院批准逮捕，这个时候，案件仍然处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仍然要跟警察打教导。但是一些重大敏感案件，不是公安向检察院、法院施加压力，而是通过另外一个部门叫政法委，这是一个党的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发号施令，却不承担责任，成为很多冤假错案的直接制造者。



结论

中国对辩护律师的打压已经从2015年“709大抓捕”引人注目的大规模逮捕转变为更不易察觉的行动，例如曲解规则、阻挠、威胁、常规性地引用法律例外条款，以及行政处罚。目标是相同的——最终用一支法律纵容者大军取代所有独立律师，他们的任务只是协助警方、检方，和法院上演他们想要的审判戏码。这种“无声镇压”是对国家法律的嘲弄，该法律在名义上保护任何被拘留者在提出请求后48小时内能够会见他们选择律师的权利。

这份报告描绘了中共如何使用三管齐下的方法：针对被拘留者、他们的家人和律师，采取接二连三的措施，旨在阻止被拘留者获得法律辩护的机会，并以剥夺职业来惩罚那些直言不讳又坚持不懈的律师。律师向当局问责的空间原本已经很小，如今更是迅速萎缩。中国境内的律师报告称，虽然这些方法的存在时间与人权律师本身几乎一样久，但近年来规模显著提升。本报告聚焦于人权案件，但在线研究也指出非敏感案件中的类似侵犯人权行为。

被拘留者被迫解雇他们的律师并接受官派律师；警方通过登记假名或不通知家人被拘留者被关押的位置，借此将他们隐藏在看守所，这样律师就无法知道他们的位置；或者被冠上国家安全罪名，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允许警察规避被拘留者自动获得法律辩护权利，并在审前拘留的前8到13个月内要求事先获得（会见律师）批准。或者，他们可能会强迫

或威胁家属不得聘请律师或解聘他们指定的律师。最后，他们可能采用威胁、恐惧和官僚障碍的综合做法，将目光投向律师。策略包括运用吊销律师证、暴力和无休止的官僚障碍来阻挠他们会见委托人的一切努力，包括捏造要求额外文书、声称没有可用的会议室或值班工作人员不足等。此外，由于2020年初新冠病毒爆发，疾病预防措施也成为阻止律师与客户会面的充分借口，无论当地是否有疫情。

尽管中国的定罪率在99.9%左右，⁹⁵但一名优秀的辩护律师可能协助减轻刑罚，通过将滥权行为公之于众来提供一定程度的问责，并能进一步将其提交报告给国际机制，最重要的是，提供一条连结被拘留者和家属的生命线。尤其，在拘留的最初几周遭受酷刑的风险最高，因此这是最需要会见辩护人的关键时期。当然，这也是律师最常见遭到拒绝会见委托人的时期。

中共正在缓慢而坚定地摧毁维权行动，同时避免大规模失踪和监禁所带来的国际关注。当所有的独立律师都消失了，国家认可的辩护律师与警察、检察官和法院之间还有什么区别？

中共向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假装其保护公民的权利。其法律文本、官员的言语和法院的判决都进行了精心编排，将他们的作秀审判伪装为公平审判。该份报告旨在聚焦中共犯下的众多侵犯人权行为的其中之一——即公开，一再重复，和广泛地拒绝被拘留者会见独立辩护律师。

附录:失去律师证的律师 (2016–2021)

	拼音	姓名	性别	年度	类别
1	Pu Zhiqiang	浦志强	男	2016	吊销
2	Wang Liqian	王理乾	男	2017	吊销
3	Wang Longde	王龙得	男	2017	吊销
4	Zhu Shengwu	祝圣武	男	2017	吊销
5	Wu Youshui	吴有水	男	2017	注销
6	Xia Lin	夏霖	男	2017	吊销
7	Zhang Zhan	张展	女	2017	注销
8	Yu Wensheng	余文生	男	2018	注销
9	Huang Simin	黄思敏	女	2018	注销
10	Sui Muqing	隋牧青	男	2018	吊销
11	Wen Donghai	文东海	男	2018	吊销
12	Yang Jinzhu	杨金柱	男	2018	吊销
13	Zhou Shifeng	周世锋	男	2018	吊销
14	Li Heping	李和平	男	2018	吊销
15	Liu Zhengqing	刘正清	男	2018	吊销
16	Yu Pinjian	玉品健	男	2018	注销
17	Chang Weiping	常玮平	男	2018	注销
18	Xie Yanyi	谢燕益	男	2018	注销
19	Liu Shuqing	刘书庆	男	2018	注销
20	Zhuang Xuezhong	张雪忠	男	2018	注销
21	Chen Jiahong	陈家鸿	男	2018	注销
22	Liu Xiaoyuan	刘晓原	男	2018	注销
23	Qin Yongpei	覃永沛	男	2018	吊销
24	Cheng Hai	程海	男	2018	注销
25	Li jinxing (Wu Lei)	李金星 (吴雷)	男	2019	吊销
26	Wang Quanzhang	王全璋	男	2019	吊销
27	Wang Yu	王宇	女	2020	注销
28	Xie Yang	谢阳	男	2020	吊销
29	Yang Bin	杨斌	女	2020	注销
30	Lu Siwei	卢思位	男	2021	吊销
31	Ren Quanniu	任全牛	男	2021	吊销
32	Xi Xiangdong	袭祥栋	男	2021	吊销
33	Zhou Ze	周泽	男	2021	注销
34	Peng Yonghe	彭永和	男	2021	注销
35	Lin Qilei	蔺其磊	男	2021	注销



- ¹早在2000年1月，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报导就描述了律师们抱怨被阻止“私下或及时”会见客户。请参阅：www.nytimes.com/2000/01/06/world/in-china-s-legal-evolution-the-lawyers-are-handcuffed.html
- ²在《中国法律翻译网》上一篇2017年的文章中，有人认为，表面上看似保障法律辩护权的改革，实际上旨在将律师塑造成“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让他们在不允许批评当局的狭隘职权范围内为委托人辩护。详见：www.chinalawtranslate.com/en/the-right-to-an-attorney-and-your-attorneys-rights/#_edn2
- ³有关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分析，请参阅保护卫士的报告《剧本和策划》：<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en/scripted-and-staged>
- ⁴Presumed Guilty report and trials of Michaels Spavor and Kovrig. (2021年7月5日). 保护卫士。由此阅读：<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en/blog/presumed-guilty-report-and-trials-michaels-spavor-and-kovrig>
- ⁵刑事诉讼法(2018年版本)的英文翻译版本取自China Laws Portal。请参阅：<https://www.chinajusticeobserver.com/law/x/criminal-procedure-law-of-china-20181026>
- ⁶刑事诉讼法也载明了律师获取与委托人案件相关证据的权利，但有大量的轶事证据显示，独立律师即使能够设法见到他们的委托人，在这方面仍经常性地受挫。对此的进一步讨论已经超越了本研究报告的范围。
- ⁷Caster, M., & Biao, T. (2019)。失踪人民共和国 (第二版)。保护卫士。
- ⁸英文翻译取自北大法律英文网。请参阅：www.lawinfochina.com/display.aspx?id=34470&lib=law
- ⁹英文翻译取自中国司法观察。请参阅：www.chinajusticeobserver.com/law/x/criminal-procedure-law-of-china-20181026
- ¹⁰关于律师如何被阻止获取证据的进一步讨论已超出了本报告的范围。请参阅：<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world/article-canadians-kovrig-spavor-get-first-lawyer-access-in-year-long-chinese/>
- ¹¹Lai, M. B. C. (2018, 5 February). Chinese anti-censorship activist Zhen Jianghua denied access to lawyer. Hong Kong Free Press HKFP. 请参阅：<https://hongkongfp.com/2018/02/05/chinese-anti-censorship-activist-zhen-jianghua-denied-access-lawyer>
- ¹²新数据显示，中国的RSDL秘密监狱犯下了危害人类罪。(2021年6月24日)，保护卫士。请参阅：<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en/blog/new-data-shows-chinas-secret-rsdl-jails-crime-against-humanity>
- ¹³关于吴淦案件的细节蒐集自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站。请参阅：www.nchrd.org/2016/03/wu-gan/
- ¹⁴维权网. (2016, 29 December). 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拒绝律师会见江天勇，律师去检察院控告. Accessed from: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16/12/blog-post_164.html
- ¹⁵VanderKlippe, N. (2020年2月27日). Canadians Kovrig, Spavor have received legal access during Chinese detention. The Globe and Mail :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world/article-canadians-kovrig-spavor-get-first-lawyer-access-in-year-long-chinese/>
- ¹⁶对程渊妻子的访谈，请参阅：www.nchrd.org/2021/03/defending-human-rights-in-the-time-of-covid-19-annual-report-on-the-situation-of-human-rights-defenders-in-china-2020/?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utm_campaign=defending-human-rights-in-the-time-of-covid-19-annual-report-on-the-situation-of-human-rights-defenders-in-china-2020



³³ 在中国，即使是名字也不安全。(2020年12月3日)。保护卫士。由此阅读：<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zh-hans/node/317>

³⁴ 这是一位名叫Jeff Harper 的美国篮球员的特殊案例。他2020年在深圳被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非法关押长达8个月之外，然后他的所有控诉被撤销，并被允许回到美国。请参阅：<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en/blog/china-even-your-name-not-safe>

³⁵ ‘I Feel Like I Am Committing Crimes.’ (2020年3月23日)。ChinaFile。由此阅读：<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en/blog/very-unusual-case-rsdl>

³⁶ <https://www.chinafile.com/ngo/latest/i-feel-i-am-committing-crimes>

³⁷ China Steps up Charges Against Activists Who Called For Political Change。(2021年1月25日)。自由亚洲电台。由此阅读：<https://www.nchrd.org/2019/05/chen-jianfang/>

³⁸ 取自保护卫士和他妻子陈紫娟在2021年所作的访谈。

³⁹ 取自保护卫士和他妻子许艳在2019年所作的访谈。

⁴⁰ China detains Tibetan anti-corruption activist on politicised charge of ‘provoking trouble.’ (2018年12月20日)。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由此阅读：<https://tchrd.org/china-detains-tibetan-anti-corruption-activist-on-politicised-charge-of-provoking-trouble/>

⁴¹ 她们分别是李和平、王全璋、翟岩民，和谢燕益的妻子。

⁴² Lai, C. (2016年7月9日)。Reluctant human rights defenders: The wives of those detained in China’s lawyer crackdown。Hong Kong Free Press。由此阅读：www.msguancha.com/a/lanmu2/2019/1203/19171.html

⁴³ 民生观察工作室。抗拒极权冷漠 无罪释放凌浩波_民生观察 关注底层民众命运。(2019年12月3日)。由此阅读：<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hongkong-nsi-08282020134543.html>

⁴⁴ China Confirms Holding 12 Hong Kong Residents From Boat Seizure。(2020年8月28日)。自由亚洲电台。由此阅读：<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hongkong-nsi-08282020134543.html>

⁴⁵ 谢文飞。(2020年8月27日)。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China。由此阅读：<https://hkanews.wordpress.com/category/%E8%89%AF%E5%BF%83%E7%8A%AF-prisoner-of-conscience/xie-wenfei-%E8%AC%9D%E6%96%87%E9%A3%9B-%E8%AC%9D%E8%B1%90%E5%A4%8F/>

⁴⁶ 张磊律师代理陈建芳案受阻_民生观察 关注底层民众命运。(2019年6月12日)。民生观察工作室。由此阅读：<https://msguancha.com/a/lanmu13/2019/0612/18693.html>

⁴⁷ 联合国难民署(2017年5月24日)。China: Repatriated cartoonist “being mistreated” in police detention center: Wife. 由此阅读：<https://www.refworld.org/docid/5971a7ef4.html> /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5971a7ef4.html>

⁴⁸ Creery, M. B. J. (2018年7月26日)。In Pictures: 6.5 years in jail for political cartoonist Jiang Yefei after Thailand sends him back to China. Hong Kong Free Press HKFP. <https://hongkongfp.com/2018/07/26/pictures-6-5-years-jail-political-cartoonist-jiang-yefei-thailand-sends-back-china>

⁴⁹ Zhen Jianghua: The Perilous Life of a Young Activist in China. (2017年1月5日)。China Change。由此阅读：<https://chinachange.org/2018/01/05/zhen-jianghua-the-perilous-life-of-a-young-activist-in-china>



⁵⁰ 这包括陈紫娟在“Free Chang Weiping”脸书页面上发表过的帖子。请参阅：<https://www.fidh.org/en/issues/human-rights-defenders/china-drop-subversion-charge-release-woman-human-rights-defender-chen>

⁵¹ China: Drop “Subversion” Charge & Release Woman Human Rights Defender Chen Jianfang (2019年10月21日)。国际人权联盟。由此阅读：<https://www.fidh.org/en/issues/human-rights-defenders/china-drop-subversion-charge-release-woman-human-rights-defender-chen>

⁵² 取自保护卫士2021年程渊妻子施明磊的访谈。

⁵³ 取自保护卫士2021年程渊妻子陈紫娟的访谈。

⁵⁴ Man Jailed Over Photo of Chinese Leader’s Daughter Gets Family Visit. (2021年5月6日)。自由亚洲电台。由此阅读：<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website-xijiping-05062021083513.html>

⁵⁵ 此处参阅2017年修订的律师法：<http://search.chinalaw.gov.cn/law/searchTitleDetail?LawID=396082&Query=%E5%BE%8B%E5%B8%88%E6%B3%95&lsExact=>

⁵⁶ 它们分别如下：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⁷⁵⁵中文版的修订规定请见此处：

⁵⁷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6/content_5113014.htm

⁵⁸ 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对这些修订作了分析。然而，他们的网站于2021年8月被关闭了。

⁵⁹ Chinese Lawyers Who Highlight Abuse of Clients To Lose Jobs Under New Rules。 (2016年10月3日)。自由亚洲电台。由此阅读：<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lawyers-rules-10032016124921.html>

⁶⁰ Top Human Rights Lawyer Stripped of License in China’s Guangdong。 (2018年1月23日)。自由亚洲电台。<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lawyer-license-01232018154542.html>

⁶¹ Feng, E. (2019年9月6日)。Inside China’s Crackdown On Human Rights Advocates. NPR. 由此阅读：www.npr.org/2019/09/06/753478775/inside-chinas-crackdown-on-human-rights-advocates

⁶² 人权律师遭打压 年检被评定“不称职”。 (2018年6月29日)。自由亚洲电台。由此阅读：www.npr.org/2019/09/06/753478775/inside-chinas-crackdown-on-human-rights-advocates

⁶³ War on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tinues: Up to 16 More Lawyers in China Face Disbarment or Inability to Practice. (2018年5月14日)。改变中国。由此阅读：<https://chinachange.org/2018/05/14/war-on-human-rights-lawyers-continues-up-to-16-more-lawyers-in-china-face-disbarment-or-inability-to-practice//>

⁶⁴ 660 Lawyers in Hunan Have Law Licenses Revoked in China Attorney Purge. (2020年9月1日)。自由亚洲电台。由此阅读：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lawyers-purge-09012020100642.html

⁶⁵ Rui, G. (2021年1月7日)。Chinese lawyer suspended after posting videos of alleged police torture。南华早报。<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3116847/chinese-lawyer-suspended-after-posting-videos-allegedly-showing>



- ⁶⁶ Yang, W. (2020年9月3日) • Chinese government revoked human rights lawyer's license after she harbored a dissident • Medium • <https://williamyang-35700.medium.com/chinese-government-revoked-human-rights-lawyers-license-after-she-harbored-a-dissident-22f0e1a9abd0>
- ⁶⁷ “I Feel Pretty Helpless Right Now”: Guangdong Rights Attorney Yang Bin • (2020年8月14日) • 自由亚洲电台 •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attorney-08142020103650.html>
- ⁶⁸ China Disbars 709 Lawyer Xie Yang Who Denied He Was Tortured in 2017 in a Deal Allowing Him to Continue His Law Practice. (2020年8月29日) • 改变中国 • 由此阅读：<https://chinachange.org/2020/08/29/china-disbars-709-lawyer-xie-yang-who-denied-he-was-tortured-in-2017-in-a-deal-allowing-him-to-continue-his-law-practice/>
- ⁶⁹ Outspoken Human Rights Lawyer Detained, Office Sealed in China's Guangxi • (2019年10月11日) • 自由亚洲电台 • 由此阅读：<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lawyer-detained-11012019142821.html>
- ⁷⁰ Poon, P. (2020年4月29日) • China: Disbarment of Human Rights Lawyers • Medium • 由此阅读：<https://patrickpoon.medium.com/china-disbarment-of-human-rights-lawyers-e75905097144>
- ⁷¹ Chinese Police Refuse Visits to Incarcerated Church Elder. (2021年7月7日) • Persecution • <https://www.persecution.org/2021/07/07/chinese-police-refuse-visits-incarcerated-church-elder/>
- ⁷² 德恒律师事务所发布了针对律师会见当事人所遭遇困难的研讨会的结论，请参阅：www.dhl.com.cn/CN/tansuocontent/0008/013277/7.aspx?AID=&BID=00000000000000001984&MID=0902
- ⁷³ China: Stop Using COVID-19 for Unnecessary Restrictions on Detainees' Visitation Rights |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2020年6月22日) • 中国人权捍卫者 • 由此阅读：www.nchr.org/2020/06/china-stop-using-covid-19-for-unnecessary-restrictions-on-detainees-visitation-rights/
- ⁷⁴ A very unusual case of RSDL. (2021年6月8日) • 保护卫士 • 由此阅读：<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en/blog/very-unusual-case-rsdl>
- ⁷⁵ Yang, W. (2021年1月18日) • Police detained two Chinese human rights lawyers overnight after they tried to visit a friend's parents • Medium • <https://williamyang-35700.medium.com/police-detained-two-chinese-human-rights-lawyers-overnight-after-they-tried-to-visit-a-friends-24c5c636f9a5>
- ⁷⁶ 2020年3月，中国推出了一款健康手机app，国民可以下载该app以获取显示其Covid健康状况的颜色码。请参阅：<https://www.nytimes.com/2020/03/01/business/china-coronavirus-surveillance.html>
- ⁷⁷ 节取自中国人权捍卫者的谢丰夏页面。请参阅：www.nchr.org/2016/08/xie-fengxia/
- ⁷⁸ 细节取自中国人权捍卫者的陈建芳页面。请参阅：www.nchr.org/2019/05/chen-jianfang/
- ⁷⁹ China: Stop using coronavirus excuse to continue imprisoning Tibetan language rights advocate.(2020年5月1日)西藏人权与民主中心 • <https://tchrd.org/china-stop-using-coronavirus-excuse-to-continue-imprisoning-tibetan-language-rights-advocate/>



⁸⁰ Turning the Tables: Interviews with Chen Guiqiu & Chen Jiangang About Revealing the Torture of Lawyer Xie Yang and the Smear Campaign That Followed During the 709 Crackdown. (2020年7月28日)。改变中国。由此阅读：<https://chinachange.org/2020/07/28/turning-the-tables-interviews-with-chen-guiqiu-chen-jiangang-about-revealing-the-torture-of-lawyer-xie-yang-and-the-smear-campaign-that-followed-during-the-709-crackdown/>

⁸¹ 同上。

⁸²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990年3月17日)。Regulations on Detention Cent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Chinese). 由此阅读：<https://www.cecc.gov/resources/legal-provisions/regulations-on-detention-centers-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chinese>

⁸³ 规定请见：<https://www.cecc.gov/resources/legal-provisions/regulations-on-detention-centers-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chinese>

⁸⁴ 细则请见：<https://www.66law.cn/tiaoli/1724.aspx>

⁸⁵ Lewis, M. K. (2017年7月23日)。Behind the Walls and Laws of Chinese Detention Centers。关键评论网。由此阅读：<https://international.thenewslens.com/article/74131>

⁸⁶ Xiao, H. & Ren, Q.,(2019年3月8日)。Legislator Calls for Taking Away Detention Centers from Police to Protect Suspects。财新国际。由此阅读：<https://www.caixinglobal.com/2019-03-08/legislator-calls-for-taking-away-detention-centers-from-police-to-protect-suspects-101389580.html>

⁸⁷ 2017年修订版本律师法：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7-09/12/content_2028697.htm

⁸⁸ 规定条文请见：https://www.spp.gov.cn/flfg/gfwj/201509/t20150921_104855.shtml

⁸⁹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对更新过后的管理办法进行分析，但在2021年8月，该组织在香港政府镇压民主派组织后将其网站撤下。请于此处参阅网站的存档副本：<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409202258/https://www.chrlawyers.hk/en/content/joint-analysis-measures-administration-law-firms-and-administrative-measures-practice-law>

⁹⁰ 可在此处找到《世界人权宣言》的文本：<http://www.un.org/en/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

⁹¹ 可在此处找到《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的文本：<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43-173.shtml>

⁹² https://www.ohchr.org/CH/Issues/Documents/other_instruments/52.PDF

⁹³ 对于“709大抓捕”的其他受害者来说，合作意味着认罪，有时候包括录制视频认罪，比如王宇律师，周世锋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翟岩民。

⁹⁴ 在中国法律下，一旦开庭的时限已过，嫌疑人及其律师和家属有权要求结束强制措施并释放。不过，国家也有权启动另外的强制措施。王全璋当时希望将预审期拖延足够长的时间，以便能够申请释放。

⁹⁵ Presumed Guilty report and trials of Michaels Spavor and Kovrig.(2021年7月5日)。保护卫士。由此阅读：<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en/blog/presumed-guilty-report-and-trials-michaels-spavor-and-kovrig>